

第二章 日據時期的時代精神與現代性

第一節 自覺和啓蒙

一、對世界的認識與現代價值的接受

1895年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這說明了它是西方現代文明，以全球規模擴張其勢力的一個結果。早在十七世紀，荷蘭和西班牙即已先後入侵臺灣，並透過相關經濟活動，取得獨占的商業利益。因為他們的目的在於原始資本的累積，因而採取重商主義政策。相較之下，十九世紀後期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的過程，是在他們為掠奪殖民地而引發的競爭漩渦中所進行，足見它帶有列強帝國主義的活動性格。英、美、德、法等列強，當時已步入帝國主義階段，個個都想獨占資本，因而有意識有計劃的在亞洲地區擴張領土。而日本佔據臺灣和朝鮮，使得日本成為這種帝國主義領土競爭的一份子，不過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則尚未達到獨占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階段。

雖然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打破了封建體制，並在國內完成了資本主義發展所需的各種建設，但是它的資本主義還屬初步階段，並未到達為擴張消費市場，非侵略他國不可的地步。1895年，由於日本獲得甲午戰爭的賠償金，奠下資本主義的基礎，並在大正時代（1912-1926）成了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正式侵略太平洋沿岸的西伯利亞，獲得了資本主義發展

的機會。如此，當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才步入世界市場並追求資本主義發展的日本，由於本身內部的諸多歷史原因、農業和工業之間引發的嚴重不均衡等因素，因而企圖透過向外發展，以求解決國內因再生產基礎的薄弱所造成的矛盾，而開始進行帝國主義殖民活動。就在這樣的背景當中，臺灣跟朝鮮一樣，成為日本帝國活動的第一目標。¹

此外，日本雖然經過明治維新，在政治、社會上脫離了封建制度，並進一步邁入現代國家之林，但其意識形態上仍然保持著前現代的「大和民族主義」，並由以天皇為首腦的軍人、官僚、政治家等封建殘餘勢力，聚成社會的基礎勢力，而這些統治階級，一開始就把富國強兵、對外擴張的侵略主義擺在第一。因此日本的殖民地政策，其目的不但放在對原料和商品市場上獲得獨占支配權的西歐列強式殖民地模式（經濟動機），同時也帶有天皇制絕對主義以及對外膨脹政策的性格（軍事動機）。² 換言之，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就是在經濟原因之外，也把軍國主義因素以從屬變數的方式加在一起。³

如此，在同時具有軍國主義和經濟掠奪性質的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臺灣在政治上被編入總督專制的中央集權官僚體系，而經濟上不但被迫扮演了宗主國工業化所需要的糧食供給基地、原料供給地、獨占的商品市場，更成了吸收日本過剩人口和資本，又被榨取其剩餘利潤的近代殖民地。所謂的近代殖民地，除了要供給原料給宗主國以外，還要替宗主國推銷商品，為宗主國容納過剩的人口與資本。⁴ 為了得到政治支配和經濟利益，雖然日本在臺灣推動所謂的現代改革，但是這與西歐追求政治民主

¹ 有關日本資本主義發展與帝國主義性格，參考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頁264-268；金哲俊，〈東洋拓植會社的事業展開過程〉（韓國社會史研究會，《韓國近代農村社會和日本帝國主義》），頁81。

² 殖民初期派武官來臺擔任總督，即可證明此點。

³ 參考申熙碩，〈日帝的殖民地支配意識形態〉；金翰喬，〈日帝殖民政策的變遷〉，國史編纂委員會，《韓民族獨立運動史5》。

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史》，頁1。

化、經濟資本主義化、人性解放以及現代民族主義發展的現代化不同，而只是在宗主國利益優先的原則之下，變相的、畸形的、片面的進行。日本只要符合自己的利益，特別是有利於本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開發，就積極投入，但是一有可能抵觸日本自身利益的疑慮，或可能危害到殖民統治的部門，例如政治民主化、人性解放、現代民族主義發展等，就會更加一層徹底的進行監視和壓制。

日本統治臺灣，經過短暫的軍令時期，從1896年開始到1921年是屬於以律令立法為原則的民政時期，這個時期以「有關必須在臺灣施行法令之法律」，就是所謂的六三法為臺灣統治的基本方針。⁵ 而外觀上以議會協贊立法的方式制定的這個法律，實際上是徹底服務於殖民母國的統治，而採取特別立法主義，尤其是其中的犯罪即決例、保甲條例、匪徒刑罰令、浮浪者取締規則等項目，在在都成為蹂躪臺灣人人權的惡之根源。在這個惡法的統治下，殖民地人民的所有政治自由完全遭到封殺，在優先考慮母國利益的前提下，只在經濟上進行資本主義化。如此到了1920年代初期，有了約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殖民地經驗之後，臺灣在日本有計劃的安排下，被迫接受資本主義及現代國家的制度，包括經濟發展和行政效率等等，整個社會結構可說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不過，由於日本採取愚民政策，教育制度尚未建立完備，對臺灣人又實施差別待遇，因此臺灣人在意識上仍然處在未現代狀態。

儘管如此，從1920年代開始，臺灣社會對不當殖民政策的批判及覺醒已開始萌芽。其現代性自覺的社會徵兆，可從以下三個方面窺其端倪：第一是來自島內知識分子的普遍覺醒，第二是以留學生為中心的新興知識分子的出現，⁶ 第三是支持前兩個集團的臺灣人資本家階級的形成。有了這些因素的結合，因而在臺灣形成了公共領域，而且現代性論述也透過這個

⁵ 黃靜嘉，《日據時期之臺灣殖民地法治與殖民統治》，頁76。

⁶ 參考黃樹仁，《日據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與角色之研究：1920-1927》，頁43-62。

管道開始傳播。⁷ 其中臺灣人資本家階級的形成，基本上由於日本公布禁止純粹以臺灣人資本設立公司的會社令，1923年以前很難成爲氣候。不過大部分的本土資本家，利用封建身分和地位，獲得大租權公債；或著受到資本家企業勃興的刺激，努力擺脫封建土地財產家的地位，而擠進了資本家階級之列；要不則是與前兩者不同的，透過介入專賣制度等有關政府權利部門來累積資本之後，變成新興資本家，也就是所謂的利權資本家。這些臺灣人資本家與日本人資本家保持著對立的態度，而一定程度上對現代性論述的形成以及抗日民族運動提供了協助。⁸

另外，由於日本未在島內提供臺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⁹ 因此新興知識分子大部分由留學日本及中國大陸的學生開始凝聚形成，他們在那邊體驗到日本的資本主義化、勞動運動、大逆事件、護憲運動等過程，開始接觸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民本主義等現代思想，並且進一步體驗見識了1917年的俄羅斯革命，以及緊接著發生的歐洲革命、朝鮮三一運動、中國五四運動、土耳其民族革命、印度的不合作運動等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情勢變化。他們已具備透視世界變化的眼光，開始正視臺灣的當前現實，並且以開放的視角摸索改革的可能方向。

這些新興知識階級決定採取不同於以往武裝流血抗爭¹⁰ 的方式來對抗日本，並且謀求改善本國現實的方法，於是推動性質較爲溫和的議會請願

⁷ 例如在初期民族啓蒙運動團體『新民會』所屬的雜誌社成立，以及發行《臺灣青年》雜誌時，受到島內有力人士辜顯榮、林熊徵、顏雲年、林獻堂等人的捐贈。

⁸ 有關臺灣資本家階級的形成，參考矢內原忠雄著，周獻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40-45；曾天富，《日帝時期臺灣左翼文學研究》，頁34-35。

⁹ 日本統治臺灣的主要政策，係以「愚民政策」爲其基調，目的是要使臺民沒有知識能力，讓其組織無能化，同時壓抑社會菁英，進而使廣大的被統治群眾成爲提供勞力的被奴役者。雖然初期還在島內設置了分師範、國語、實業三部份的國語學校，但也僅止於初、中等的教育而已，絲毫不讓臺灣人民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參照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頁34-43。

¹⁰ 武力抗爭從「臺灣民主國」的衛臺之戰開始，至1915年西來庵事件，始終持續不斷。其中從1907年至1915年爲止，因此而犧牲的義民不計其數，僥倖生存者中，有4423名被判死刑，682名判無期徒刑，1474名判有期徒刑。

運動，以及以文化協會為主體的新文化運動。概括地看，武裝流血抗爭算是來自臺灣人民義不臣倭的民族情操，¹¹ 而議會設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則是受到下列兩方面的影響所造成：一個是受到中國辛亥革命的成功、民族自決、社會主義等世界性思潮的外部影響，另外一個是跟隨著政治制度的法制化、經濟資本主義化、公共設施的現代化等全社會結構質的變化所引起的內部影響。受到這兩方面的影響，他們認為有必要轉換運動形態及路線，因為他們知道之前的武裝流血方式已無法達成運動的目標。¹² 這些都說明著，在臺灣的日本統治已一步一步地被確立，資本主義現代化也已經慢慢地打好基礎，同時也是報紙、雜誌等公共領域的形成及擴張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公共領域的形成，提供給知識分子發表政論性論說的絕佳機會，並且隨著討論機會的增加，知識人社群也逐漸形成，非武裝民族運動的方式也慢慢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

非武裝溫和的抵抗運動，嚴格來說是從1921年標榜著啓蒙，展開新文化運動的『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時，開始正式啓動。不過這些運動的徵兆，在文化協會成立以前，就已經出現，如1920年前後由林獻堂、蔡惠如、蔡式穀、林呈祿、王敏川、黃呈聰、莊垂勝、彭華英、吳三連、鄭松筠等人在日本組織『聲應會』、『啓發會』、『新民會』，並且創辦《臺灣青年》、《臺灣》等報章雜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先聲，並把這些刊物傳入臺灣，正式開啓了島內啓蒙運動之大門。『新民會』以「研究臺灣所有應予革新之事項，並圖求文化之發達為目的」，¹³ 作為宗旨，展開以民族主義啓蒙運動及合法政治運動為骨幹的民族運動。其中前者透過《臺灣青年》的出版，而

¹¹ 例如林圯埔事件、土庫事件、關帝廟事件、苗栗事件、六甲事件和西來庵事件等，起義目的大都為驅逐異民族日本人，主事者有稱帝者，有擬建立臺灣王國或共和國者。黃昭堂，〈臺灣人的反殖民及Nationalism的發展〉，《百年來的臺灣》，頁302-303。

¹² 有關從武裝流血運動轉變為非武裝的民權政治運動，一般是從受到武裝革命的侷限、梁啓超的思想，以及新興知識分子的出現等多重因素的複合影響來進行解釋。

¹³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頁25，新民會章程。

後者則透過「六三法撤廢運動」及「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來具體推動。而『新民會』的精神，很快的沿襲到以蔣渭水為中心的島內知識分子，他們聯合彼此力量成立了島內民族運動的開宗祖師—『臺灣文化協會』。1921年成立的文協「以做為臺灣本島之民族運動下啓蒙運動的指導團體」，「以助長臺灣文化的發達為目的」。¹⁴ 他們認為有獨立的文化，才能成為獨立的國家，而其最終目的在於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¹⁵ 雖然文協受到總督府的監視，不得不放棄所有政治活動，表面上表明以純粹文化團體來出發，但是在積極地扮演文化啓蒙的角色之餘，對凝聚臺灣人意識和啓蒙政治意識上也頗有貢獻。透過這樣的歷史事實，我們可以知道，臺灣人雖然仍然屬於殖民地國民，但是一旦有了現代自覺就會投入社會運動，他們先透過啓蒙運動來傳播現代文明，讓一般人普遍認知到自國所處的現實狀況，然後努力以具體行動達成目標。

首先，造成二〇年代知識分子在意識上能夠自覺的原因，可以說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世界情勢變化有所認知的關係。從1914年到1918年，發生了人類空前的全面性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的爆發可說是歐洲各國的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已到達了再也不能共存的地步而產生的必然性衝突。在這當中，世界各國的利害關係亦錯綜複雜的糾纏在一起，期間還發生了美國的參戰及俄羅斯革命等世界性事件。因此，這個全面性戰爭的結果，對往後世界歷史的發展，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響。毫無疑問的，就剛起步的臺灣知識界而言，普遍都對這個世界性的事件，表現出莫大的關心。

由著這個絕對的大不幸，死不完的全人類，已從既往的情眠醒了。厭惡黑暗而仰慕光明—這樣的醒了。反抗橫暴而從正義—這樣

¹⁴ 矢內原忠雄，前揭書，頁90。

¹⁵ 林柏維，前揭書，頁67。

的醒來了。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獨尊之野獸生活，而謀共存的、犧牲的、互讓的之文化運動—是這樣的醒來了。瞧！國際聯盟的成立、民族自決的尊重、男女同權的實現、勞資協調的運動等，無一不是這個大覺醒的賞賜。

臺灣的青年！高砂的健兒！我人還可儘默著不奮起嗎？不解這種大運動的意義，或不能共鳴的人，那種人已失其為人之價值了，何況是要做一個國民呢？¹⁶

所謂軍國主義之欲滅人國，占人地者，無非欲為自國民經濟充裕計也。而其結果至於如斯。各國均覺悟軍國主義之非策。遂將變而為經濟主義。簡言之，則民生主義也。民生主義之欲昌明天下。其始也。必先使世界人類。無智無愚。無婦人孺子。皆受同等之教育。皆有相當之程度。並享其同等之自由。此無一切之畛域。無一切之階級。原根相等。同異如一。乃能與世界經濟場眾謀共同生活。此自然之趨勢也。然而從前所受的愚民政策之殖民地土民。其程度之能受同等教育享同等自由與否。是一問題。今假定其程度之不堪受也。必也先觀其土民之自覺如何。然後依其自覺之程度為標準。立解放之。漸次而歸於平等。此悲天憫人之政策，為近世各國政府所應採之方針也。¹⁷

（歐洲大戰）逼演曠古之悲劇，而究其所獲結果，或將得而未得者何，曰正義人道，曰自由平等，曰國際聯盟，曰勞動階級之解放，曰民族自決之運動，其他論題叢多，不遑枚舉，惟推其終局之目的，未始非欲求吾人於社會上，得以安定生計，保全精神上自由之幸福而已。¹⁸

這回聯合國的戰勝，簡直就是民衆的「文化主義」的勝利了。如今舊的世界成了廢墟，新的世界又將誕生的時候，我們對於過去的信仰希望，當然也不得不新陳代謝了。世界上百般的制度，都是進

¹⁶ 1920年《臺灣青年》創刊辭·卷頭言；後亦刊登於《臺灣民報》七十二號(1925.9.27)。

¹⁷ 耐農李漢如，〈發刊之辭〉，《臺灣青年》一卷一號(1920.7.16)，頁7-8。

¹⁸ 林慈舟，〈敬告吾鄉青年〉，《臺灣青年》一卷一號(1920.7.16)，頁36。

化上的過程。又宇宙間的森羅萬象，都是現滅不斷的事物。我們既若曉得這個道理，便就明白個人、國家、社會都是很不完全不固定的東西。那麼今日想得很合理的事，明日或者就不合理了。又今日想得很切要的事，明日或者也就變成很不關重要的事。…例如經濟界的恐慌、思想界的變遷、以及階級的鬭爭、勞資的對峙，鬧得翻天覆地，豈不是世界上有史以來的大地震嗎？查了這回大地震的震源，却在戰爭以前積來的壓迫，和榨取積罪惡發了源的。偶為歐戰發生，便就闡明這麼罪惡的真象。於是，人類為要確立恒久、普遍、均等的生存，思想的潮流也就新機一轉了。其餘如社會組織的改造，支配關係的革新，以及種種的解放，幾乎不可勝數。要之，社會的改造，已從理想的時期轉到實行的時期了。¹⁹

透過《臺灣青年》和《臺灣民報》刊載的內容，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知識分子已經明確地指出，第一次大戰的爆發原因，應歸為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同時第一次大戰之後所引發的民族自決、人權重視、男女同權、勞資協調等潮流，也應以時代精神來認識，並且呼籲臺灣青年能夠參與這樣的精神自覺。他們共同認識到這些民族自決主義、國際聯盟的成立、俄羅斯革命的成功等世界情勢的變化，就是擺脫之前的帝國主義、軍國主義，而轉換到和平共存、經濟主義、民生主義、文化主義的趨勢，並認為其基本精神是和平、正義、人道、自由和平等。他們並且反省了因戰爭中大量使用毒氣瓦斯、坦克、飛機、潛水艇等新式武器，造成千萬人以上戰死及兩千萬人受傷的慘劇，而為了避免這麼嚴重的人類慘劇再次發生，開始摸索能夠確保永久性的和平、自由平等以及人權、民生安定的方案，準備要重新出發。由此可知，他們相當理解當時的世界情勢，而有了這些精神的認識，就能把民族運動的路線，從武裝抗爭轉換成非武裝的文化主義抗爭。同時對時代精神的這些認識，便成為自覺殖民地臺灣處境的一個契機，也變

¹⁹ 炳，〈社會改造和我們的使命〉，《臺灣民報》一卷四期(1923.7.15)。

成了要求改善不平等、不自由、非人道的民族生活的一個理論根據。²⁰

知識分子對世界情勢的變化有了共同認識之後，便開始著手對民衆的啓蒙教育。在總督專制下過著不平等生活的臺灣人民，普遍都不知道世界歷史的潮流及演進，他們即使被剝奪了經濟利益，也渾然不自覺。知識分子爲了啓發民智，對他們進行意識上的啓蒙，首先就要設法讓他們知道世界的情勢，並大量介紹現代思想和思潮；同時他們也呼籲國民，特別是對臺灣青年，強調認識國家處境以及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性。除了上面引述的文章之外，另外像王敏川的〈臺灣青年發刊之趣旨〉和〈論先覺者之天職〉²¹、吳克己的〈臺灣青年自覺論〉²²、蔡鐵生的〈臺灣青年之大責任〉²³、蔡培火的〈臺島與我等〉²⁴、鄭策詳的〈吾人之思想有差遠乎〉²⁵、芳園的〈對臺灣青年之希望〉²⁶、錫的〈臺人重大的使命〉²⁷ 等文章中，也都先後介紹了世界歷史的演進，明確地主張要參與這樣的歷史發展，並呼籲臺灣人民自覺。而由啓蒙的內容來看，從初期主張爲了生計安定和幸福，對社會共存的意義及學識必須有所覺醒，到1923年《臺灣民報》創刊時，已經開始呼訴民衆要瞭解弱小民族的悲哀，更要設法擺脫高壓的統治。像這樣，從初期知識分子所主張的自覺論，慢慢演變到抗日民族運動，這個過程可說是一個從普遍覺醒人爲天賦人格體的基本認知，進而重視自由、健康、幸福、人權、人道主義精神等價值所在，發展到要求以世界情勢的變化來作爲借

²⁰ 在《臺灣青年》一卷二號(1920.8.15)，頁21中，登載了林仲輝的〈訪代議士永井柳太郎氏有感〉，文中有以下一段話：「時屆矣。機來矣。大戰而後。正天心厭禍。人意好平之時吾輩亟宜乘時努力。大加考察。革昔日之舊染。建文運之新猷。俾正義人道實現于兩間。語云，柔能克剛。又云，力不足以服人。設吾輩能以思想克復強權。智力打勝蠻野。」

²¹ 《臺灣青年》一卷一號(1920.7.16)，頁40-41；二卷四號(1921.5.15)，頁12-15。

²² 《臺灣青年》一卷四號(1920.10.15)，頁16-19。

²³ 《臺灣青年》一卷五號(1920.12.15)，頁4-5。

²⁴ 《臺灣青年》一卷五號(1920.12.15)，頁35-42。

²⁵ 《臺灣青年》二卷三號(1921.3.16)，頁22-23。

²⁶ 《臺灣民報》一卷一期(1923.4.15)。

²⁷ 《臺灣民報》二卷十四期(1924.8.1)。

鏡，呼籲臺灣人民對自身的處境徹底覺醒，並發起民族運動以尋求改變現實。

除了這些呼籲臺灣人民的自覺論以外，介紹世界情勢的報導也一直持續不斷的被刊登出來，如介紹近世殖民史²⁸、第一次大戰後的朝鮮、印度等世界情勢²⁹、有關世界殖民地的統治形態³⁰、美國新大總統瑕殿氏之就任演說³¹、第一次大戰中俄英德的情勢³²、國際聯盟³³ 等等。另外從〈太平洋會議者何〉³⁴、〈各國的學制〉³⁵、〈國際聯盟的使命〉、〈世界政治的新傾向〉³⁶、〈中日關係的現在及將來〉³⁷、〈菲律賓獨立運動之推移〉³⁸、〈德模克拉西的實現—歐洲十九世紀的思潮〉³⁹、〈比島的排斥總督獨立運動〉、〈埃及國及國權黨的再興〉⁴⁰、〈英伊承諾露國的經過〉、〈朝鮮的政治〉⁴¹、〈可決自治案的印度議會〉⁴²、〈顏智氏入獄後的印度獨立運動的經過〉⁴³ 等文章中所看到，除了單純的介紹世界各國的消息以外，也常刊登有關朝鮮、印度、菲律賓等各殖民地的現狀，提供給國民思考臺灣自身的殖民地處境的機會，試圖引導國民的普遍覺醒。不僅如此，〈中華政局概觀〉⁴⁴ 等有關中國消息，從初期民報時期到殖民末期，始終沒有中斷過，例如國民黨和軍閥之間的情

²⁸ 黃天民，〈近世殖民史概要〉，《臺灣青年》三卷二、四、五號(1921.8.15；10.15；11.15)，頁14-29；34-44；38-46。

²⁹ 蔡伯汾，〈朝鮮印度安南菲律賓與歐戰之影響〉，《臺灣青年》二卷四號(1921.5.15)，頁9-15。

³⁰ 林慈舟，〈世界殖民地統治上之對人政策〉，《臺灣青年》二卷二號(1921.2.26)，頁1-6。

³¹ 《臺灣青年》二卷三號(1921.3.26)，頁12-22。

³² 邃園，〈歐戰中的三奇〉，《臺灣青年》二卷五號(1921.6.15)，頁20-22。

³³ 羅玉書，〈國際聯盟說〉，《臺灣青年》二卷五號(1921.6.15)，頁33-36。

³⁴ 《臺灣青年》三卷二號(1921.8.15)，頁19-24。

³⁵ 《臺灣青年》三卷三號(1921.9.15)，頁29-35。

³⁶ 《臺灣民報》一卷一期(1923.4.15)。

³⁷ 《臺灣民報》一卷四期(1923.7.15)。

³⁸ 《臺灣民報》一卷五期(1923.8.1)。

³⁹ 《臺灣民報》一卷七、八期(1923.9.15；10.15)。

⁴⁰ 《臺灣民報》一卷十四期(1923.12.21)。

⁴¹ 《臺灣民報》二卷五期(1924.3.21)。

⁴² 《臺灣民報》二卷十一期(1924.6.21)。

⁴³ 《臺灣民報》二卷十二期(1924.7.1)。

⁴⁴ 《臺灣民報》二卷八、九、二十七期(1924.5.11；6.1；7.11)。

勢變化以及有關中國情勢的分析和各團體的主張等，每次都仔細又有深度的加以介紹，甚至在1931年前後，言論自由受到最嚴重箝制的時候，報紙的一半以上充斥著中國消息，可見知識分子對祖國的情勢及革命過程，表現出異常的重視。

另外，知識分子注意到世界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日益熾熱，無產者的權利主張也逐漸受到世人注目，便對臺灣處境有所覺醒。因此他們開始重視促使產生這種可能的價值觀，認為要先用這個價值觀開導國民，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處境之後，再透過這種覺醒，凝結成力量。例如〈權利之觀念〉⁴⁵、〈對內根本問題之一端〉⁴⁶、〈我之所望於青年—平等與自覺心〉⁴⁷、〈利己與愛人〉⁴⁸、〈個性與組織〉⁴⁹、〈民主主義為世界和平之真基礎〉⁵⁰、〈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⁵¹、〈社會連帶論〉⁵²、〈道德之概念〉⁵³、〈論個人主義的意思〉⁵⁴、〈宿命與努力〉⁵⁵、〈新舊思想的衝突〉⁵⁶、〈言論的價值〉、〈新時代的修養〉⁵⁷、〈教育進化論〉⁵⁸、〈愛國心是什麼〉⁵⁹、〈怠惰很誤人〉、〈論立憲的教育〉⁶⁰、〈青年生活的三要素〉⁶¹、〈正義與權力〉⁶²、〈要求參政權

⁴⁵ 蔡式毅，《臺灣青年》一卷一號(1920.7.16)，頁31-35。

⁴⁶ 蔡培火，《臺灣青年》一卷一號(1920.7.16)，頁46-53。

⁴⁷ 蔡鐵生，《臺灣青年》一卷一號(1920.7.16)，頁53-54。

⁴⁸ 林獻堂，《臺灣青年》二卷一號(1921.1.15)，頁1-2。

⁴⁹ 《臺灣青年》二卷二號(1921.2.26)，頁37-35。

⁵⁰ 高格勞博士，《臺灣青年》二卷四號(1921.5.15)，頁1-8。

⁵¹ 張我軍，《臺灣民報》二卷七期(1924.4.21)。

⁵² 劉明朝，《臺灣青年》三卷三號(1921.9.15)，頁2-9。

⁵³ 石霜湖，《臺灣青年》四卷一號(1922.1.20)，頁16-20。

⁵⁴ 聰，《臺灣民報》，一卷三期(1923.5.15)。

⁵⁵ 醒民，《臺灣民報》，一卷三期(1923.5.15)。

⁵⁶ 劍如，《臺灣民報》，一卷五期(1923.8.1)。

⁵⁷ 《臺灣民報》，二卷五期(1924.3.21)。

⁵⁸ 慈志生，《臺灣民報》二卷八、九期(1924.5.11；6.1)。

⁵⁹ 《臺灣民報》二卷十期(1924.2.11)。

⁶⁰ 錫，《臺灣民報》二卷十四期(1924.8.1)。

⁶¹ 張友鶴，《臺灣民報》二卷十四期(1924.8.1)。

⁶² 慈，《臺灣民報》二卷十六期(1924.9.1)。

問題》⁶³、〈吾人當盡社會一分子的責任〉⁶⁴、〈青年學生與社會運動〉⁶⁵、〈從事文化運動的覺悟〉⁶⁶、〈真理和迫害〉⁶⁷、〈現代思潮與新人物〉⁶⁸等民報社論和專欄中，都看得出對軍國主義、武力萬能主義作出了批判，然後對世界情勢轉換到經濟主義、民生主義、文化主義的趨勢表示贊成跟認同，並且介紹符合這個時代的自決、平等、博愛、自由、人格尊重、人權平等等時代精神。每篇都是把重視普遍人性的價值觀和時代進步結合在一起，並強調這些價值觀以及時代變化對臺灣青年的覺醒有所幫助。茲舉出具體的例子如下：

文化是和自然相對立的意義，若像原始時代的人，都是自然生活的居多，被自然環境的支配，隨外部威力進行，沒有力量改造環境，個個都抱有宿命觀念，這就是叫做自然生活，即野蠻生活，是以維持現狀為其特色，和文化生活是大不相同的。文化的創造，是征服自然，是將日日生活不斷改造的，人類和一般動物的差異，即僅生存是決不能滿足，定要望得智識學問種種有日新的狀態，故很努力利用自然環境，使服從自己的危地，文化人和自然人的區別就在這點。…故日本國維新當時，亦有兼採西洋的道德，來教導人民，立憲的教育，是重在養成人格，有獨立的人格，才得有自由的思想，發展文化的能力，平等受治的制度，此種人格觀念，要由舊禮教，是不容易得來，在於西洋造成的現代文化，都是胚胎於此，所以我們臺人現在不可隨聲附和，一味排斥西洋文化，我們先要善取他的精粹，至於我東洋的道德，如仁愛的觀念，是再當尊重，來發揮我們的長處。⁶⁹

⁶³ 《臺灣民報》二卷二十三號(1924.11.11)。

⁶⁴ 前非，《臺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1.1)。

⁶⁵ 鵬陞，《臺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1.1)。

⁶⁶ 錫舟，《臺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1.1)。

⁶⁷ 醒，《臺灣民報》三卷八號(1925.3.11)。

⁶⁸ 《臺灣民報》第七十一號(1925.9.20)。

⁶⁹ 錫舟，〈從事文化運動的覺悟〉，《臺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1.1)。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把文化理解成與自然對立的概念，認為創造文化的意義，不只在於能征服自然，而且能改善每天的日常生活，因而主張要接受新知識及學問。他們舉日本為例，強調日本因接受了西方的立憲教育、人格尊重、自由思想等潮流，所以能夠發展出新文化，進而主張要求接受這些新知識和思想，以提高臺灣文化的水平。文中分析了西方和東方的優點，認為都應學習，並且強調西方現代文明中所養成之獨立人格的訓練，更成為培養出自由思想以及進一步達到文化發展能力的基礎。如此一來，早期知識分子看著世界史的進展，認識到現代價值的重要性，然後將它形塑成一個啓蒙話語，以傳達到臺灣人民的心中。⁷⁰

二、對民族處境的自覺及改善之主張

經歷過世界性的變化，已得到現代自覺的知識分子，很快地便將它變成理論根據，並把它用來審視及批判種種壓抑之下受苦的臺灣現實，同時進一步開始摸索可能改善現況的方法。

我島歸屬日本帝國版圖，將近三十年了。當局竭力拓植，用心經營，只就表面上看起來，實在夜不閉門，路不拾遺，可算是很平

⁷⁰ 在《臺灣青年》和《臺灣》中刊載的一些對一次大戰後世界思潮發表感想的日本學者文章，多少直接影響到臺灣的知識分子。主要的文章可列舉如下：永井柳太郎，〈世界的文化與臺灣人的使命〉（《臺灣青年》一卷三號，1920.9.15）、〈近代政治之理想〉（同雜誌三卷二號，1921.8.15）；海老名彈正，〈啓發臺灣文化之方針〉（同雜誌一卷五號，1920.12.15）；北澤新次郎，〈勞動運動及新文化之創造〉（同雜誌二卷五號，1921.6.15）；泉哲，〈太平洋會議者何〉（同雜誌，三卷二號，1921.8.15）；友枝高彥，〈新世界之秩序與新道德〉（《臺灣》三年一號，1922.4.10）；野村淳治，〈民衆政治之意義與價值〉（同雜誌三年九號，1922.12.1）；佐野學，〈弱小民族解放論〉（同雜誌四年六號，1923.6.10）等。

靜的。康莊大道，輪奐高樓，可算很壯觀的。會社林立，物資層出，可算很快活的。但從裏面看起來，我們同胞的經濟很不好了，負擔又再加重，雖是勤儉粒積的百姓，也恐怕入不敷出了。老者不能學，幼者無可學，雖是堂堂的皇帝子孫，也恐怕與野人無大異了。歐洲前後，思潮大變，世界上人人都曉得求自由平等，唱人道正義，我們島內同胞，若沈醉不醒，深迷不悟，也恐怕將無顏可以見世界上的文明人了。⁷¹

在這裡所提及有關不平等的經濟、政治、教育以及不滿的情緒，成為這個時期抗日民族運動的動力。其中，政治自決問題—自治制度，是從啓蒙時期開始，一直到殖民末期，就不斷被提起，並持續被要求改善的主要懸案。可見政治的自治，一直被認定為殖民地臺灣首要解決的問題。當時其他弱小民族，受到民族自決主義的鼓舞，紛紛展開了民族獨立運動，臺灣知識分子也順著這個風潮，積極的投入爭取自治的運動。

他們的作法，首先是向一般大眾介紹臺灣的政治環境，報導臺灣地方制度的沿革，⁷² 明確地讓同胞知道臺灣目前的狀況，然後再對日本的領土延長主義、同化主義的治臺政策提出批判，⁷³ 進一步強力地要求日本實施自治制。現試就當時他們所訴求的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第一、爲了促使臺灣在政治上能夠自治，開始展開具體行動。首先，他們推動臺灣議會設立請願運動。在推動這個運動的背後，即隱含著知識分子對平等、民族自決等戰後世界思潮的認知。林呈祿（茲舟）對自治制這個議題，竭盡所能地試圖以學術性方式進行討論，他認爲臺灣被日本殖民統治已有25年之久，已經遠離過去軍政及警察時代的黑暗期，因此，未來

⁷¹ 慈舟，創刊詞，《臺灣民報》一卷一期(1923.4.15)。

⁷² 例如林慈舟，〈改正臺灣地方制度概論〉、〈六三法問題之沿革〉，《臺灣青年》一卷四號(1920.10.15)；林慈舟，〈六三法問題之沿革〉和記者，〈六三法問題之運命〉，同雜誌一卷五號(1920.12.15)；黃呈聰，〈保甲制論〉和黃天民，〈就臺灣議會而論〉同雜誌二卷三號(1921.3.16)等即是。

⁷³ 蔡培火，〈吾人之同化觀〉，《臺灣青年》一卷三號(1920.9.15)，頁16-28。

要走向光明，第一步便要確立立憲政治；而在此時刻，民衆的覺醒、努力和奮鬥精神，將是決定性因素。⁷⁴ 他又認為現代民衆的政治自覺，便是實施地方自治的依據，而且他認定統治者階級單方面支配，而被統治者階級單方面服從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已經是講求民衆利益、民衆自行主張及自行管理的時代。他說：「今日之臺灣，則不得不使之順應乎時勢之推移，適合乎人文之發達，因而此過渡的舊制，當失其存續之根據」，⁷⁵ 認定過去在臺灣所實施的官治，只不過是一個過渡期的政治形態，如今早應失效。他分門別類的介紹世界殖民地的統治形態時，又強調：「如果以戰勝心理來採取強壓政策而魚肉新殖民的話，那便是蔑視世界大勢，忘却人類共存之本義，只知經濟作用，而不解人道正義為何物的行爲」，因此，要求日本採取合乎時代潮流的自治政策。⁷⁶

另外，在議會設立請願運動的請願書中，也詳加說明了臺灣的現況，其中提到地方秩序已井然有序，但是民意傳達的部分顯然還不夠，「殊如今番歐戰之結果，實促世界人類多大之覺醒，文明諸國之外交內治，亦與以緊切之暗示，推而釀成社會改造之機運…（臺灣統治制度）鑑世界之潮流，徵民心之趨向，宜速準據立憲之本義，故須順應臺灣事情之立法，即就臺灣住民公選議員組織臺灣議會以行之…」，⁷⁷ 主張要實施符合世界潮流，與自決原則相應的殖民地政策。自治運動中所主張的具體內容，主要是要求以立基於立憲法治的原則來統治臺灣，並設立民選議會，俾能達成由臺灣人統治臺灣的目的。這意味著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國的發展，以及各國對世界和平所付出的共同努力，均已影響及於臺灣知識分子的意識改造及對自我處境的覺醒。如同前項所做的說明，當時的報章雜誌，持續不斷的介紹有關一次大戰發生前後的國際情勢、歷史進展及民主主義精神。他們就

⁷⁴ 〈地方自治概論〉，《臺灣青年》一卷三號(1920.9.15)，頁3-15。

⁷⁵ 〈改正臺灣地方制度概論(上)〉，《臺灣青年》一卷四號(1920.10.15)，頁1-16。

⁷⁶ 〈世界殖民地統治上之對人政策〉，《臺灣青年》二卷二號(1921.2.26)，頁1-6。

⁷⁷ 記者，〈就臺灣議會設置之請願而言〉，《臺灣青年》二卷二號(1921.2.26)，頁19-25。

以這些知識作為基礎，引導民衆能確實體認臺灣的不平等現實，進而培養他們具備批判涵養，以向統治者提出改善措施。1920年適逢六三法的後身—三一法的效力期滿，⁷⁸ 主張廢掉此違背人權野蠻惡法的聲浪達到了最高潮。知識分子以高明的邏輯，揭穿日本所謂內臺平等說法的假象。日本雖主張臺灣主權歸屬日本，却又不給臺灣人應有的憲法保障，這是違背日本的立憲精神。他們以這樣的邏輯為依據，主張廢除對臺灣人不利的惡法。⁷⁹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知識分子把日本的統治臺灣，認定是違背平等和民主意識的統治機制。而且，要求改正或廢止臺灣統治基本法的許多文章中，處處充滿著要求參政權、享有言論自由⁸⁰、實施保障人民權利的行政裁判法⁸¹ 等的聲音，在在都反映出現代性認識對知識分子的影響。這些都證明當時知識分子是以肯定的態度接受現代性。誠然，西歐是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法國大革命等社會變革之後，才爭取到個人自由、人格尊重、理性思考、平等意識，以及政治自由、現代民主制度的發展。因此，現代初期的臺灣知識分子，也充分的肯定及接受西方現代進程的歷史進步想法，並且嘗試拿這些世界歷史進展的動力，運用到自己國家處境的改善方針上。⁸²

第二、平等意識和人道主義精神，成為改善教育制度的理論依據。當時日本採取愚民政策，實施對臺不平等的差別政策，以致臺灣人想進入高等教育機關接受教育，却不得其門而入。為此，知識分子提出教育制度必須改革，要求擴大實施普通教育。在這個議題上，他們所採取的策略是，表

⁷⁸ 三一法於1906年制定，1920年法律效力期滿。

⁷⁹ 林慈舟，〈六三法問題之運命〉，《臺灣青年》一卷五號(1920.12.15)，頁17-29。

⁸⁰ 林呈祿，〈改正臺灣統治基本法與殖民地統治方針〉，《臺灣青年》三卷一號(1921.7.15)，頁1-12。

⁸¹ 社論〈希望施行行政裁判法於臺灣〉，《臺灣民報》二卷三號(1924.2.21)。

⁸² 由《臺灣民報》所刊登的〈德模克拉西的實現〉(一卷七、八號)、〈地方自治制概論〉(一卷九~二卷一號)等介紹西方學術思潮的報導，即可知道。

面上同意臺灣扮演中國和內地間的橋樑角色，⁸³ 以及日本對臺灣的成功管理是東亞和平關鍵的說法；⁸⁴ 但是，真正的想法却是在敦促總督府實施能使臺灣人民人格受到尊重，個性得以正常發展，同時又能接觸世界文化的教育制度。⁸⁵ 也就是說，他們是以現代性為依據，提出了革除不合理、不平等教育政策的改革方案。

現在世界文化日新。大有一瀉千里之概。一事一物之發明。朝出現而夕已遍及全國。此不外乎。社會教育宣傳之力所致也。吾臺僻居東海之濱。既與世界文明隔絕。縱有一二略具一知半解之徒。而無宣傳能力。欲求文化之進步。其可得耶。欲求人群之幸福。其有可得乎。為今之計。欲民智之早開。無更要於社會教育者也。使知識普及也。使明世界潮流之趨勢也。使知團結合群之必要也。皆為目前當務之急。蓋知識不普及。則不解求幸福之所在。不明世界趨勢。則無所守。而失確定方針。不知團結之必要。則乏進取實力。要之社會教育即所以補學校教育之不足。求現在社會之積弊。願我臺人其注力於此點。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協力宣傳。知道之。啓發之。使人人各知盡其天職。以求最大之幸福。合群策群力以為之。吾知彼時當無不奏刀而立解也。⁸⁶

這篇主張社會教育的文章，提到世界文化日新月異的現在，臺灣人應該要團結起來，透過教育來熟悉世界潮流，認識進步文化。除了主張高等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實施之外，他們也呼籲統治者重視普通教育、義務教育、師範教育、專門教育、私立教育、內臺人共學制、女性教育和農民教育等等。

⁸³ 吳克己，〈臺灣青年自覺論〉，《臺灣青年》，一卷四號(1920.10.15)，頁16-19。他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將臺灣定為中國和日本的橋樑角色。其代表說法有，永井柳太郎，〈世界的文化與臺灣人之使命〉，同雜誌，一卷三號(1920.9.15)。

⁸⁴ 蔡培火，〈隔二年後之歸臺〉，《臺灣青年》三卷二號(1921.8.15)，頁9-16；王敏川，〈書房教育革新論〉，同雜誌四卷一號(1922.1.20)，頁27-36。

⁸⁵ 黃呈聰，〈臺灣教育改造論〉，《臺灣青年》三卷二號(1921.8.15)，頁1-7。

⁸⁶ 莊狷夫，〈社會教育之必要〉，《臺灣青年》第二卷第一號，頁8-9。

⁸⁷ 教育議題的訴求也和議會請願運動一樣，在整個殖民期間持續不斷的展開，它可說是文化運動的一環，也是抗日民族運動的主要論題之一。

第三、在爭取言論自由方面，也是以民主意識、人權精神、平等意識為理論根據。當時日本當局禁止在臺發行報紙，制定新聞紙令約束《臺灣民報》等報刊雜誌的言論自由，甚至還制止普受民衆歡迎的『文化協會』的演講活動，強制解散讀書會等各種民間團體的活動。面對這些不合理的狀況，他們提出批判，指責這些政策是專制時代的古法，會造成民聲壅塞、官民隔絕現象，不僅不符現代民衆政治的主旨，也是國家社會發展上的阻礙因素。他們進一步要求日本當局，拿出適合文明國家水平的人權意識和平等意識。⁸⁸

這個時期，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對日本殖民地政策提出批判，並摸索實際改善方案以外，知識分子同時也推動了一連串活動來強調民族精神。他們開始區分「民族」和「國民」的概念，企圖讓民族精神的思想萌芽，並確立民族的認同。由於總督府日益強化的監視和檢閱行動，使得這些活動受到掣肘。雖然如此，不過他們透過報紙及文協活動等公共場域，仍然不斷地宣導民族觀念。這些內容包括：臺灣人民雖歸屬於日本帝國，但是根本上仍屬漢民族的後代；⁸⁹ 反對廢止漢文；⁹⁰ 主張中國文化的傳播；⁹¹ 關心中國革命趨勢及中國問題；強調日本和臺灣民族之間的差別性；⁹² 回顧中國古典思想⁹³ 等。民族精神不但是這個啓蒙時期民族運動的主要理論根

⁸⁷ 關於臺灣教育制度的不平等問題，一些日本學者也提出有改善必要的意見，例如：泉哲，〈敬告臺灣島民〉（《臺灣青年》一卷一號，1920.7.15）；後藤朝太郎，〈為臺灣文化而言〉（同雜誌一卷三號，1920.9.15）等。

⁸⁸ 〈發賣禁止〉，《臺灣民報》一卷十號(1923.11.11)；雪谷，〈豈有不許言論自由的善政嗎〉，《臺灣民報》三卷三號(1925.1.21)。

⁸⁹ 錫，〈臺人重大的使命〉，《臺灣民報》二卷十四號(1924.8.1)。

⁹⁰ 王敏川，〈書房教育革新論〉、〈漢學復興之前驅〉，《臺灣民報》二卷一號(1924.1.1)。

⁹¹ 章太炎，〈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問的發達〉，《臺灣民報》二卷一號(1924.1.1)。

⁹² 蔡培火，〈漢族之固有性〉，《臺灣青年》二卷三號。

⁹³ 在《臺灣青年》二卷四、五號，各刊載了〈孔子教育學的研究〉和〈荀子教育學的研

據，更成了下一個時期民族解放運動的精神基礎。『文化協會』也扮演起散播民族精神的角色，譬如在安排各種演講時，暗露詛咒總督政治及挑撥民族的反感之口吻；撰寫《臺灣通史》、《中國學術概論》等著作時，也充斥著對臺灣總督府之施政是壓迫本島人之諷刺敘述；不僅如此，在諸多講演的言論中，雖不乏各種層面的知識傳遞，但主題除了文化啓蒙以外，實際上又在種種講題中蘊含著「議會政治」、「自由民主主義」、「殖民政策之批判」、「民族自決」等意旨或觀點，試圖藉以喚起民族精神。⁹⁴ 由下面幾篇文章中，我們就可看出這些情形：

臺灣改隸以來，漢學衰頹，日趨日下，而公學課程，又廢漢文，却後數十年，蚩蚩臺民，皆無詩書之薰陶，而乏祖國之觀念勞力服從，莫能議論，亦為政者之妙策也，然漢學為東洋文明之精華，而軒黃子孫之所寶惜者，以是山澤癯儒，庠序學子，慨然隱痛，守敏抱殘創為詩社，以相勉勵，而研究文章者尚少，即欲研究，又若無師，未得窺其門徑，深以為憾。⁹⁵

我等是純粹的漢民族，擁有四千年之文化，此文化冠於世界，是世界之盟主，然而今日地位却由於欠缺自覺與團結而低落了！⁹⁶

由於日清戰爭中國戰敗，自此以來，日本人蔑視中國人為清國奴，我在琉球及日本旅行每每聽及如此之惡言。而我們的祖國是中國啊！⁹⁷

究）。

⁹⁴ 相關資料參考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頁127-130。

⁹⁵ 〈漢學復興之前驅〉，《臺灣民報》二卷一號(1924.1.1)。

⁹⁶ 陳來成，〈黎明之青年〉，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轉引自林柏維，前揭書，頁130。

⁹⁷ 黃白成枝，〈信仰、懷疑、知識〉，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轉引自林柏維，前揭書，頁130。

可見他們對身為漢民族後裔，是感到光榮的。他們同時也把漢字看成是體現民族文化的象徵，藉保存漢文來凝聚民族精神，並用來對抗日本的同化政策，避免民族遭到淪亡的命運。

散播民族意識的活動，雖然大部分遭到遏阻，不過在文化啓蒙的範圍內，仍然被持續的推動著。他們區隔臺灣文化和日本文化的不同，強調臺灣固有文化的正當性。我們試看黃呈聰力倡創設臺灣特種文化的主張，⁹⁸ 他認為臺灣固有的文化，是移植自中國文化，再加上臺灣特有的歷史經驗和地理環境，相互混合產生。由是，他反對日本的強制性同化政策，力主不要盲目的模仿高等文化，而應注重建設臺灣的特種文化。黃氏極力反對採用日本式地名、強制使用國語（日語）、獎勵採用日式衣食住習慣等的政策；他對漢文使用的限制、學術研究上的束縛，提出相當強烈的批判，憂心臺灣因此完全被日本文化同化。不過，他却贊同接受像交通設備、衛生設施、產業開發等日本物質文化的移入。他認為這些物質文化是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來的資本主義產物，正符合臺灣追求現代文明的需求。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處在被強制現代化過程中的殖民地知識分子，一方面積極追求生產工具的現代化，以趕上進步的世界文化，同時另一方面又極力保存自國精神文化的矛盾立場。

這樣的立場不只黃呈聰一個人才有，下引林子瑾所寫的文協會報中，同樣可以感受得到：

愚見臺灣文化的運動方針，對於物質的方面，當虛心採用歐美諸國；對於精神方面，宜極力保存中國傳來之固有的文化；然日本之文化，間亦有可採用者，一言以蔽之曰：渾合三種文化，而另構成一種之臺灣之新文化也。又對於橫的方面猶當注意，臺灣開化者，極占少數，故不得不由橫的方面進展，如印行淺近出版物，通

⁹⁸ 〈應該着創設臺灣特種的文化〉，《臺灣民報》三卷一號(1925.1.1)。

俗講演，改良戲，又多設影戲院，小圖書館，讀報社等類。然臺灣人原為優秀民族，且係古代文明之子孫，對於縱的方面，更宜竭歷發揮，如公派青年出歐米留學，或促成臺灣大學，其他電氣、航海、專門學校等。⁹⁹

在物質方面，主張要虛心接納西方的先進技術；但在精神方面，則要極力保存中國傳來的固有文化。可見這樣的想法和立場，是當時知識分子站在殖民地立場上，透過日本接受現代文化時所面對的共通現象，也成為往後抗日民族運動方向出現爭執時，不斷重複被提起的議題。也就是說，「文明開化」和「民族精神」這兩種矛盾的想法及立場，正是臺灣現代初期的現代性內容。

那麼黃呈聰所主張的臺灣特種文化，到底所指為何？所謂臺灣特種的文化，是指適合臺灣自然環境，如地勢、氣候、風土、人口、產業、社會制度、風俗、習慣等，又能發揮臺灣獨特性，促進社會發達的文化。受到總督府監視的緣故，雖然發言人無法直接反映出臺灣所處的現實狀況，並對此提出批判，不過，他絕對是反對日本强行推動同化政策，並強調臺灣文化的自主性，可見他的意識仍是以民族主義精神作為基礎。

綜合以上的說明，我們知道現代初期的臺灣知識分子，接受了現代文明思潮和現代價值，並在這個基礎上，體認到殖民地臺灣的窘況，因而提出了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層面的平等方案。同時，他們還拿出不同於日本的臺灣民族性，來反對同化政策，他們絞盡腦汁，為的無非是努力保存自我民族的文化。

⁹⁹ 〈文化之意義〉，文化協會《會報》第一號。轉引自林瑞明，〈臺灣新文學運動理論時期之檢討〉，《聯合文學》164期，頁168。

三、文化啓蒙與女性解放

啓蒙時期的知識分子，在展開反帝國主義民族運動的同時，也不遺餘力的試圖打破封建思想。他們不只接受了平等、自由、民主、人道主義等的現代價值觀，還對自然科學和技術發展、衛生觀念，以及合理的、技術的現代性，展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們不厭其煩地介紹現代科學的進步狀況，以及生理學、物理學、化學、衛生學等各種分科的自然科學，¹⁰⁰ 企圖提升臺灣人民的現代科學知識，藉此打破迷信、舊思想和舊習慣。不僅如此，他們進一步相信人的理性、個人自由，要求自由戀愛。¹⁰¹ 其中，蔡培火算是最重視現代科學的知識分子，他不僅在報刊雜誌上持續的引介自然科學，還對許多學科的科學原理加以詳細說明。

蔡培火對文化運動訂定了兩層目標。其中第一層目標是人格運動，他認為人要捍衛自己的生存權，首先必須先具備相當的人格才行；他進一步解釋，所謂文化運動就是人格運動，就是要使大家的人格不受束縛，被解放出來，然後互相接觸、砥礪，如此每個人的人格一旦真正建立起來，不但能夠產生力量，在既有的文化上發揮，也能創出越發適意的新文化，使他的生存更加美滿，更加快樂。第二層目標為喚醒民衆自覺，可茲運用的方法，除演說、演劇、音樂和競技以外，還有以臺灣話來運用的文字，他認為艱澀的漢字會阻礙臺灣人民的意識開化及文明普及，因此主張漢字的羅馬字化。¹⁰² 從他的主張中，可以知道啓蒙時期知識分子，普遍接受了以

¹⁰⁰ 相關文章有刊載於《臺灣青年》蔡培火所撰之〈述空氣之概要〉、〈科學方法之大要〉及〈就水而言〉等文章，以及刊登於《臺灣民報》科學欄的〈家庭電化和其實例〉、〈人類發生的樂園是在哪裏〉、〈換頭的新手術〉、〈無線電話〉等報導。

¹⁰¹ 相關文章有刊登於《臺灣民報》的〈提倡家庭的改造〉、〈貞操的新觀念〉、〈男女平等論〉、〈迷信之種類〉、〈迷信也可獎勵和提倡嗎〉、〈宜速破除迷信的陋風〉、〈婦人的地位和社會的關係〉等。

¹⁰² 蔡培火，〈在文化運動所定的目標〉，《臺灣民報》138號(1927.1.2)，頁8-11。日本學者當中也有人持同樣的看法，例如：植村正久，〈願望臺灣之青年〉(《臺灣青年》一卷

人性的解放、人格覺醒為主的西歐啓蒙精神，並將重點放在個人對人性的普遍覺醒上。

文化啓蒙的另一個主要論點在於女性解放。他們認為臺灣女性的地位及處境，最缺乏平等意識、自由思想、人格尊重、人權強調等的現代精神。因此女性問題，始終就是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討論相當熱烈。當時臺灣女性的命運相當坎坷，在父權的威權之下，不僅無法接受教育，連婚姻自由也被剝奪，甚至成為童養媳、養女，而一輩子過著悲慘的生活。為了改善女性這種嚴重不平等地位及人權遭到蹂躪的情況，知識分子開始進行啓蒙教育。首先，他們為女性同胞注入啓蒙意識，喚起女性本身的自覺，然後嘗試打破具有性別差異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此外，他們亦藉報導各國女性解放的事例，來作為提出改善女性現實方案的參考依據。包括屬於女性啓蒙範疇的，如重視女性自覺的教育¹⁰³、主張廢除男女差別¹⁰⁴、獎勵自由戀愛和自由結婚¹⁰⁵ 等方案；屬於改善男女差別制度範疇的，如改革納妾制度、廢除法律上的不平等、改善婚姻制度的舊俗、打破社會不良制度¹⁰⁶、檢討家族制度¹⁰⁷ 等方案。另外，他們也以報導英國等先進國擴張女性參政權、各國婦女的政治活動¹⁰⁸ 等的作法，試圖借鏡先進國家的例子來喚起社會的注意，可見他們為了達成女性解放的目的，從啓蒙到爭取平等和自由，有意識、有計劃的持續不斷的進行著。

一號，1920.7.15)；田川大吉郎，〈歐美的思潮與羅馬字〉(同雜誌一卷三號，1920.9.15)；海老名彈正，〈啓發臺灣文化之方針〉(同雜誌一卷五號，1920.12.15)。

¹⁰³ 陳英，〈女子教育之必要〉，《臺灣青年》一卷二號，頁19-20；王敏川，〈女子教育論〉，同雜誌一卷三號，頁41-43。

¹⁰⁴ 黃璞君，〈男女差別撤廢〉，《臺灣青年》二卷一號，頁34-36。

¹⁰⁵ 陳崑樹，〈根本的婚姻革新論〉，《臺灣青年》三卷六號，頁23-31。

¹⁰⁶ 劍，〈徹底的婦人解放運動〉，《臺灣民報》一卷三號(1923.5.15)；秀湖，〈婚姻制度的進化概觀〉，《臺灣民報》二卷三號(1924.2.21)。

¹⁰⁷ 劍如，〈家族制度的將來〉，《臺灣民報》二卷七號(1924.4.21)。

¹⁰⁸ 在《臺灣民報》的「內外時報」欄中，持續介紹各國婦女運動的動向。

夫世之有人類，而男女判焉，男女判而家庭立焉，家庭立而社會成焉，社會成而教育于是乎在。是以由草昧而開化，由開化而文明，日新月異而歲不同也。于以知社會之組織，必重于教育，教育之施原無分于男女，故曰有教無類蓋謂此也。然而教育者亦有其道，其道維何則三而已矣。曰國家教育曰社會教育曰家庭教育是也。…家庭者製造人類之始基也。陶冶其精神養成其習慣實足為國家社會之先鋒。然而家庭之教育要宜先自女子來也。今日雖為女子而異日將為婦為母，若僅為女子時代短而責任輕，若至為婦為母時代長而責任重。一旦結褵伊始家庭之興替，子孫之賢愚，以及種種之服務皆在為婦為母之時代肩其荷負，是則女子之教育固有刻不容緩者也。¹⁰⁹

女權運動久已在歐米發生，現在已經認定了。今日移到東洋的地方，日本自數年前已經有向會議請願…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自五四鬧到現在，其要求比較日本徹底些兒，所出手段也是強烈，但是關於實際上的運動，其成績還算是很少，大部分都是沾染鬧貴族的思想，偏向第三階級之方面進行，大家都以為只要取得和男子同樣的參政權、遺產權、就算是滿足，就算是已經同男子站在一個水平線上面，不必再往前進行，可以偃旗息鼓了。像這樣的運動，不是算做解放運動底成功了。…近世產業革命以來，資本制度把階級關係弄簡單了。就是社會分作兩大階級，一個是有產階級，一個是無產階級，女子自古就是勞動者，被掠奪的，資本制度，撤廢了性的障壁，變成了構成無產階級分子，所以女子解放的要求，是從這階級對抗的事實中發生出來的，階級的手段，也要從這中裡產出，只看我們的階級的覺悟如何罷了。¹¹⁰

從上面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現代女性解放的論述，在初期的《臺灣青年》時代，著重在女性妻子和母親的角色上，強調女性教育為家庭教育的一環；不過到了1923年所發行的《臺灣民報》時候，已經從男女平等、機會

¹⁰⁹ 陳英，〈女子教育之必要〉，《臺灣青年》一卷二號(1920.8.15)，頁19-20。

¹¹⁰ 〈徹底的婦人解放運動〉，《臺灣民報》三號(1923.5.15)。

均等的要求，進展到以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另一階段，來說明女性解放問題。換言之，婦女問題的焦點是從尊重普遍人格，擴大到婦女參政權的主張、階級鬥爭的手段等，慢慢地再發展到與民族問題、階級問題的結合。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婦女解放運動，以非常快的速度，與社會主義階級意識結合。這是因為當時的女性問題，本身即包含著擺脫舊習慣和禮教束縛的反封建性質，不僅具備了尊重人格、人權解放等解放的現代性屬性，它更是在殖民地現實上，能夠凸顯出對異民族統治批判，以及人權遭受蹂躪的一種象徵，同時，它也是關係著民族自治及民族平等乃至解放的一個問題。因此，女性解放問題，在往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始終持續不斷的被拿出來討論。

四、啓蒙時期的現代性特徵

現代初期的臺灣知識分子，首先認知到的是現代世界史進程及其推動力—現代價值。他們透過公共領域的擴張，對一般民衆進行啓蒙教育，並提出能改善殖民地不合理待遇的方案。新興知識分子的這些努力與要求，目的在追求兩種現代性—工具的現代性和解放的現代性，他們重視科學技術帶來的進步，同時也追求人的個性、平等、博愛、自由、人權等精神價值。處在殖民地的臺灣，追求這兩種現代性，意味著與日本帶來的現代化政策，維持一定程度的關係。

其中，技術的、工具的現代性，乃是日本所強制的資本主義化之物質基礎。雖然日本引進臺灣的，並非重視合理思考的科學精神，而且大部分都僅屬於技術層面；不過臺灣知識分子，在接受技術的、物質的、制度的現代性的同時，仍然不忘追求科學精神。他們認為這些合理主義、科學的

思考，才是西歐列強得以發展的背後動力。可見合理性和科學精神，成為知識分子意識到民族處境，進而突破這個處境，開闢光明未來的一個指標。他們相信西方國家的現代發展，並積極的推動現代學問及學術思潮的啓蒙。

不過他們很快的就看出日本在臺灣強行推動的資本主義，是在以宗主國利益為優先的原則下進行，而各種不平等政策，以及自由被壓抑的情況，也層出不窮。因此，他們開始把注意力，從技術的現代性，轉而集中到解放的現代性。解放的現代性，更加注意個性尊重、平等意識、自由思想、人權尊重，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精神內涵。他們在這個認知上，要求改善不合理的現實。如上所述，要求自治制、教育平等、人事平等權、經濟利益的合理分配、臺灣人的地位向上提升等主張，都是植根於重視個人、尊重人格、平等、博愛、人權、人道主義等解放的現代性。加上以改善殖民地現實的依據來接受的這個解放的現代性，具有反帝國主義特質。因此可以這麼說，臺灣的現代化與西方的反封建經驗不同，它是循著反帝國主義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路徑而發展的。

一般認為西歐的現代起點為文藝復興時期，那時新興資產階級透過工商業活動，蓄積了不少資本，並進行有效管理。他們在這個基礎上，選擇比較有利於支配社會的資本主義體制。因此，在這個階段，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打破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封建體制。他們聯合農民的勢力，打垮貴族階級，並主導建立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民族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反封建鬥爭被列為最優先的主要目標，因為反封建鬥爭的本身，在經濟上能帶進資本主義生產的方式，使生產力飛躍增進；而在政治上，透過現代民族國家的成立，促進了民主主義的發展，這剛好符合了當時民衆的期望和利害關係。

西方係因自生的新興有產階級的成長，而達到自發性現代化，相較之下，在二〇年代的臺灣，正處於主權被剝奪的殖民地環境。臺灣資本主義

的發展，是由殖民國日本所主導，因此，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及成長，不僅不易，而且速度緩慢。另外，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現代制度及價值觀方面，也是處於單方面從日本強制引入的狀態。再加上資本主義體制的採用及發展，都以日本資本家的利益為優先考量，因此，對許多臺灣資本家和民衆來說，資本主義的進展，並沒有帶給他們任何經濟效益，更別說像西方經驗中政治民主獲得充分發展的契機。當時的臺灣已有25年的被殖民經驗，雖然具備了現代制度和資本主義化所需要的物質基礎，但是歷經軍政時期及警察政治之後，民族差別和不平等待遇日益加深，已到了別說是一般民衆，連資本家也很難期望享受現代化果實的地步。由於被日本強制實行的現代化，只保有現代性的外殼—經濟資本主義和工具的現代性，並且是以片面的、變態的方式進行，因此，民族自決、平等意識等現代觀念較容易打動知識分子。他們以這種「解放的現代性」來當作理論武器，來進行一連串要求改善民族現實的運動。也因為這個原因，臺灣的現代化及其過程中所反映出來的現代性，反帝國主義的成分多於反封建。這是不同於西方的特殊性，也是臺灣所擁有的「複數的現代性」。

初期知識分子，在接受西方現代精神的同時，也努力推動反封建和反帝國主義運動。他們採取文化啓蒙的方式，在合法的範圍之內進行改革，這是因為他們所持的理論根據，係第一次大戰後以和平、文化主義為主的思潮，再加上採取同化主義的總督專制政權，對他們隨時進行監督及限制活動的關係。不過，以理性、人權、平等精神為基礎出發的文化啓蒙運動，隨著臺灣人的要求不被採納，民族的差別待遇日益加深，因此而逐漸轉變成重視臺灣文化獨自性、鼓吹民族主義精神，以及強調固有文化的抗日民族運動。鼓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想法，在強調反封建的文化啓蒙運動當中，可說是具有相當的異質性。因此，啓蒙時期臺灣的現代性經驗，呈現出不同於西方，也相異於中國的特殊性。中國的五四運動，是以反封建為主軸的內容，透過對傳統的絕對否定，以及對西歐文明的全盤接受，來推

動中國的現代化。相較之下，在臺灣的現代性，以普遍理性為根據，既批判了阻礙現代文明發展，及妨害個性和人格成長的封建思考，同時也強調民族固有的精神與獨自性，呈現著雙重性質。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雖然淪為列強下的半殖民地，但是他們相信經過一番反封建運動，仍然可以達到社會改造，以及建立現代國家的希望。亦即五四時期的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還保有創造自身歷史的主體性。相反地，臺灣雖然已經在帝國主義的主導之下，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現代化，但因主權的喪失，又在言論自由受到嚴重干涉和壓制的情況下，不僅無法自由發表反帝論述，自然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在臺灣，與其一味的破壞傳統，不如堅持自身的固有性，來對抗異民族的支配，並接受現代價值，謀求未來發展，才是知識分子所選擇的可行方案。

透過以上的討論，我們知道1920年代的臺灣知識青年，在認知現代這個「他者」的方式上呈現出雙重性，那就是一方面接受西方現代的啟蒙精神，另一方面又強調傳統、獨有的民族文化。前者為堅持積極接受普遍性現代的立場；後者却與此相反，堅持固守傳統文化。不僅如此，臺灣因其殖民地身分，在接受現代性上，必然與殖民母國有所牽連。例如從《臺灣青年》、《臺灣》的論調，迥異於《臺灣民報》文章論調的情形，我們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現代性論述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前者強調提高臺灣文化的目的，在於扮演中國和日本的橋樑角色，而促進東亞的和平及教育臺灣人民，可以協助日本永續發展；到了後者，這樣的前提已經消失，主要論點是在要求廢除對臺灣人民的不公平政策。

因此，我認為我們在研究臺灣現代時，如把它單純歸結為反封建和反帝國主義來進行思考，那將無法了解現代的複雜性。同樣地，只用殖民地現代化角度來看，也將得不到全面性的理解。因為封建/反封建、帝國主義/反帝國主義的二分法思考，必定不容許任何一個中間項目的介入，它將維持絕對的排他性，是一個極端主義性質的認識論架構，同時也是具有自我封

鎖的想像力體系。在二分法思考的背後，通常隱藏著某種的政治目的。而站在殖民地現代化論的立場，認為由帝國主義移植過來的現代化，對往後的國家發展也有所貢獻，這樣的說法同樣也是具有政治目的。

由以上的分析和討論，我們知道，臺灣的步入現代，是由早已接受西方現代文明洗禮的日本所主導。在這個過程中，早期知識分子想用西方的現代，來克服西方現代所造成的殖民地困境，結果却面臨了進退兩難的矛盾局面。因此，他們的現代化方案，不得不帶有固守民族性和追求普遍性的雙重性格。日據時期—臺灣進入現代的時期，也可以被規定為一種舊與新、傳統與進步成分，共存又共同競爭的空間。如果研究者能秉持著這樣的態度，就可以擺脫以統一原理或單一規範來看待現代性所帶來的困擾。如此，才能有效預防各研究者按照自己的政治目的，或權力意志，來任意解釋的現象發生。具體而客觀的原貌再現，將可帶領我們正確地把握多元的現代經驗。

第二節 社會主義發展與解放努力

一、社會主義發展的背景及進展

世界性社會主義，是從源自馬克思理論的急進民主理念¹¹¹發展而來；它藉著1917年俄羅斯革命的成功，露出了向實際社會付諸實踐的可能

¹¹¹ 依巴里巴的見解，從法國革命中分化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的三大政治思想，其中，社會主義是在「草根性民主主義」的觀點上，再構成法國革命的理念，這可以解釋為，社會主義是站在民主主義的急進傳統上發展出來的。參考巴里巴，尹素英編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頁262。

曙光，終而擴散到全世界。它引進臺灣的時間，是在二〇年代初期，透過《臺灣民報》系列報章雜誌的介紹開始。¹¹² 到了1923年以後，社會主義論述已超越了單純被介紹的水準，逐漸呈現出與臺灣社會現實相結合的趨勢。從這個時期開始，《臺灣民報》的有關階級對立、弱小民族的政治解放，以及主張回復經濟等社論當中，開始呈現出社會主義的觀點。例如站在無產者文化運動的觀點上，主張成立夏季學校和勞動學校；在勞動者解放的觀點上，討論了農民運動；以階級鬥爭和唯物史觀，來解釋婦女運動及風俗改良，並透過批判殖民地解放問題和思想統制的討論，找出改善方案，來解決當時臺灣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¹¹³ 連溫卿、蔣渭水等具有左翼傾向的知識分子，組織了『社會問題研究會』，透過講演會等活動，開始宣傳社會主義觀念，並啓導民衆意識，不久之後，臺灣社會便普遍接受社會主義思潮。

如此，社會主義在臺灣的發展，在二〇年代初期，與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啓蒙運動，可說幾乎是同時起步。究其原因，除了受到社會主義潮流之世界性擴散影響以外，從屬資本主義化所造成的本土資產階級的不健全發展，¹¹⁴ 以及主導文化啓蒙的資產階級改良化，應是其主要背景。臺灣處在帝國主義勢力的直接影響圈內，日帝勾結了國內買辦封建勢力，阻礙正常的資本主義發展，因此造成國內資產階級的成長，受到嚴重的打擊。衆

¹¹² 較爲初期的文章，有中山啓，〈生物學上之愛國者與危險思想家〉，《臺灣青年》一卷四號(1920.10.15)，頁28-38；蔡鐵生，〈論中國將來之興亡〉，同雜誌，二卷一號(1921.1.15)，頁2-4；彭華英，〈社會主義概說〉，同雜誌，二卷四號(1921.5.15)，頁50-57；北澤新次郎，〈勞動運動及新文化之創造〉，同雜誌，二卷五號(1921.6.15)，頁25-28；佐野學，〈弱小民族解放論—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臺灣》四年六號，1922.6.10，頁74。

¹¹³ 評論〈多設夏季學校的必要〉，《臺灣民報》119號(1926.8)；〈倡設勞動學校〉，同報133號(1926.11)；〈徹底的婦人解放運動〉，同報一卷三號(1923.5)；〈婚姻制度的進化概觀〉，同報二卷三號(1924.2)；〈五一和民族運動〉，同報104號(1926.5)；〈時代和思想的取締〉，同報107號(1926.5)等即是。

¹¹⁴ 在1923年以前，由於日本對臺灣頒布了會社令，禁止以純粹臺灣人的資本設立公司，因此本土資本階級的形成，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所周知，民族資產階級的成長微弱又不健全的現象，普遍都出現在走過從屬資本主義之路的第三世界國家裡，其結果往往導致民族經濟不能在民族資本的基礎上穩健發展，這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自生成長，反而變成嚴重的桎梏。從屬資本主義化所造成的這些惡質影響，最終帶來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其中相當多的人，便選擇向帝國主義勢力妥協靠攏，來謀求自身的活路。就由於這個原因，促使民族資產階級走上改良化路線，而以他們為階級基礎的新文化運動，必然的暴露出一定程度的改良主義傾向。¹¹⁵ 議會設立請願運動的再三失敗，犬羊禍事件的發生¹¹⁶ 等之前的合法性民族運動，也就因此受到嚴重的挑戰，同時暴露出其侷限性。也因此，『文化協會』所主導的啓蒙運動，再也無法擁護日益窮困的基層民衆的利益，而抗日民族運動的中心，也就慢慢轉移到以無產階級為主的民衆陣營中。

社會主義在臺灣的正式發展，是從1927年『文化協會』的分裂開始。原本網羅不同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邁開步伐的文協，在1926年陳逢源和許乃昌、蔡孝乾之間，因中國的改造問題進行討論，¹¹⁷ 而開始陷入左右鬥爭局面；到了第二年，左派正式掌握指導權，文協急速的左傾。左翼民族主義者連溫卿、王敏川等人，掌握文協的主導權之後，便取消不從事政治活動的舊文協綱領，提出了往後的運動方向，也就是永遠要為農民、勞動者、小商人及其他小資產家階級，積極展開活動。因此也就積極的直接投入與或支援學生、勞動者、農民等的各項左翼政治運動。

同時期，隨著農民組合的急速成長，造就了二〇年代初期開始在中

¹¹⁵ 除了犬羊禍事件以外，曾經擔任『文化協會』總會召開時的議長林子瑾，後來也加入反對『文化協會』主導的一些活動而成立的『公益會』，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¹¹⁶ 推動議會設立運動的林獻堂，因臺灣銀行的負債問題，被總督府要求離開議會設立請願運動，林獻堂則接受總督府的要求。這個事件對當時民族運動的展開，有相當大的影響。

¹¹⁷ 相關文章有芳園(陳逢源)，〈最近之感想(二)我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20、125號)；許乃昌，〈駁陳逢源氏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26-129號)；芳園，〈答許乃昌氏的駁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30-132、135-138號)；蔡孝乾，〈駁芳園君的中國改造論〉(臺灣民報134號)；許乃昌，〈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臺灣民報142-143號)等。

國、日本等地活躍的左翼人士與島內左翼人士之間的連繫，之後更發展為臺灣共產黨的成立。如此，從1927年到1931年之間，臺灣的抗日民族運動便結束了統一戰線時代，繼而分成左右兩大陣營，其中左翼陣營，乃開始進行以無產大眾為主的抗日運動。¹¹⁸

蔡孝乾在〈轉換期的文化運動〉¹¹⁹一文中分析說，社會運動之所以轉換，係深受殖民資本主義的經濟榨取及廣大大眾的文化解放欲求逐漸提高的關係。

在過去及現在的文化，都是由於大多數的大汗苦力所創造出來的。在過去，文化是大眾的，在未來，應當也是大眾的。然而在現在，文化差不多完全成了有閑階級的佔有品。把這有閑階級佔有的文化，解放為大眾的文化，便是時代的要求。文化協會的宗旨改為「促進實現大眾文化」，實在是應現時代的潮流啊！文化協會改組的重大意義，就是在乎這點。¹²⁰

總之，無論在農民、在工人、在青年、在婦女，都漸漸覺醒起來。由這覺醒所披露的民眾的要求以至開始爭鬥了！這些形勢的總和，都足以證明臺灣的思想界已進入轉換期了。最近，自陳芳園君發表「中國改造論」以來，引起了許乃昌、蔡孝乾君等的反駁，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論戰正在極烈。這也是臺灣思想界轉換期中的特徵之一。有了思想界的轉換，才促成了文化協會的有意義的改組，才證明了臺灣思想界的有意義的轉換。¹²¹

可見蔡孝乾認為，經濟基礎的變化帶來了思想的變化，而無產大眾這個議題便是這個變化的核心。

¹¹⁸ 參考簡炯仁，《臺灣共產主義運動史》，頁39-57。

¹¹⁹ 蔡孝乾，〈轉換期的文化運動〉，《臺灣民報》142-143號(1927.1.30-2.6)。

¹²⁰ 〈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一)〉，《臺灣民報》142號(1927.1.30)。

¹²¹ 〈轉換期的文化運動(二)〉，《臺灣民報》143號(1927.2.6)。

接著，我們不妨透過《臺灣民報》的實際報導，來看看各個年度農民和勞動者運動的發展狀況，以及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在1923年最後一期的《臺灣民報》社論中，提到了「我臺灣資產階級日漸傾壞，大農變作小農，小農變作勞動者，中等學校畢業生，皆為下級雇傭人，一言以蔽之，即臺灣資本家的勞動化不是我們與讀者諸君很要注意的地方嗎？」¹²² 可見他們已經對臺灣人民從屬於殖民資本主義，並且日益勞動者化的處境有所警覺，因此希望能改造社會。另外，該報又在1924年7月刊載了〈臺灣勞動問題一面觀〉¹²³ 的報導，文章中除了仔細地敘述製糖會社的橫暴外，還分析說，在這種被榨取的情況之下也沒發生勞動問題，是因為勞動者、農民們沒有知識的緣故，因此呼籲民衆要相互團結，進行運動。這個意見被刊出不久的十月，蔗農組合成立的必要性問題被正式提起；¹²⁴ 到了1925年1月，二林大城兩庄民因蔗糖收買價格及獎勵金問題，與林本源製糖產生糾紛，蔗農組合也就順勢被組織了起來。¹²⁵ 在召開二林農民大會時，他們決議向總督府提出陳情，並要求製糖會社提出改善措施，¹²⁶ 從此以後，指責製糖會社的經濟榨取事例及討論芭蕉問題的文章急速的增加。¹²⁷ 接著，全國各地小規模的農民糾紛陸續發生，臺北洋服工友會跟著成立，勞動者組織也逐漸增加。由此可見，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過程，是從農民組合組織運動開始，慢慢延燒到勞動者的組織性運動，¹²⁸ 社會主義理念也從此進入了

¹²² 〈歲暮的感想〉，《臺灣民報》一卷十四號(1923.12.21)。

¹²³ 醒民，〈臺灣勞農問題一面觀〉，《臺灣民報》二卷十三號(1924.7.11)。

¹²⁴ 劍如，〈論蔗農組合設置的必要〉，《臺灣民報》二卷二十號(1924.10.11)。

¹²⁵ 〈二林大城之兩庄民奮起組織蔗農組合〉，《臺灣民報》三卷二號(1925.1.11)。

¹²⁶ 〈二林農民大會〉，《臺灣民報》三卷三號(1925.1.21)。

¹²⁷ 例如〈絕對不採取經濟榨取的方針〉、〈不但共鳴更要合作纔是〉、〈林糖蔗農的陳情〉、〈芭蕉的自由移出問題〉、〈再論芭蕉自由移出問題〉(民報三卷七、九、十號、63、65號)等文章即是。

¹²⁸ 從1925年前後開始，佃農、竹林、芭蕉、蔗糖問題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退職官吏的土地拂下問題及製糖會社的土地收買，引發了各地農民的忿怒，農民組合在此時開始組織成立；到了1927年，已成立的勞動者組合進行罷工抗議，農民組合全島大會，以及臺灣機械工友會全島大會等大型活動，接二連三的進行，勞動者、農民的組織性無

實踐的階段。

如上所述，社會主義從進入臺灣開始算起，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就得到急速的發展，並以社會主義理念—無產階級解放為理論依據，在社會各階層間展開有組織性的解放運動。之後，無產青年的政治運動從「啓蒙」轉向到「解放」，整個抗日民族運動的方向也有所轉變。¹²⁹ 這個現象的背後有幾個原因：第一、社會主義思潮以猛烈的速度普及到全世界，影響到殖民地臺灣的抗日民族運動路線。特別是日本、朝鮮、中國等鄰近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刺激了更多的臺灣無產青年投入解放運動。¹³⁰ 第二、從啓蒙時期開始便不斷要求改善的許多主張，如自治制、教育平等、惡法廢除等，一直都沒能得到回應。不只得不到改善，隨著殖民地資本主義體制的日益鞏固，日帝對臺灣人民利益的結構性掠奪益形顯著，屬於無產階級的大部分臺灣人民，經濟上被榨取的情況，已到無可復加的地步。我們都知道，不管是哪個運動的展開，必須要有國內土壤—社會條件的成熟方才可能。社會主義在臺灣的發展，就與日本一手主導的資本主義所造成之矛盾極大化，有著密切的關係。一如前面所說，臺灣的現代化是在日本利益優先的原則之下，以幫助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為目的而進行。日本佔臺後實施土地調查事業，打好資本主義的基礎，但在這過程中，臺灣農耕地總面積的八分之一，被納編到以日本財團為主的新式製糖會社裡。而在林野調查事業的過程中，因大量被裁定官有權，日本資本家的進入臺灣，也因此得到法律的保障。¹³¹

此時臺灣屬於資本主義前期階段的殖民地，因商業資本尚未累積，只

產階級解放運動，迅速燃燒到全國各地。

¹²⁹ 在《臺灣民報》139號(1927.1.9)「卷頭言」〈解放運動的進程〉中，把其間的抗日民族運動定義為解放運動，文章內容討論從事解放運動的人士應該注意的事項。

¹³⁰ 在臺灣左翼運動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找到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間的密切關係，例如在臺灣組織農民組合，以及發生農民爭議時，都得到日本左翼人士來臺協助和辯護。

¹³¹ 有關農耕地推移狀況，以及佃作關係的變化，請參考警察沿革誌編纂委員會，《臺灣社會運動史IV：農民運動》，頁1-41。

是具備初期的資本形態而已。隨著許多日本商業資本家在臺設立各種企業，臺灣開始準備進入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日本把初階目標放在振興殖民地內部的企業發展，爲了開拓出口的大量通路，這些日本企業大量生產殖民地臺灣的主要物產。在臺設立的各種日本企業，讓日本商業資本家們獲得更多的利潤，進而支配整個生產過程，並轉變成爲產業資本家。透過這些過程，臺灣逐漸被編入屬於日本的從屬性經濟體系中。其中，製糖會社的設立及經營最具代表性。因爲製糖業乃當時臺灣商業的大宗，可以代表日據時期臺灣的資本主義化過程及其特性。在臺灣，原本就有製造赤糖的糖廠及製造白糖的糖間，隨著日帝的產業發展政策重點放在製糖業，他們開始計劃以企業形態來經營製糖業。他們開始建設由大資本出資的新式機械工廠和中小工廠，以及具備機械設備的製造場，如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等大企業，以及所謂改良糖廠的中小資本家企業，就如雨後春筍般的應運而生。其結果，毫無疑問的，別說臺灣原有的糖廠和糖間，就連改良糖廠也步入被日本新式製糖會社併吞的命運，因而導致臺灣蔗農越來越加貧困。由日本企業資本家主導的新式工廠，以壓倒性的比率完全支配了臺灣的糖業部門，到了1926-7年，新式工廠佔去製糖總生產量的95.3%，總生產金額的98%，也就是說，製糖工業已完全被控制在日本大資本家手裡。如三井、三菱、藤山等日本資本家企業，在糖業部門以獨占支配的形態來搜刮利潤，並以這個利益爲基礎，投入金融業，不斷地促使其本身的產業資本增值，繼而進入到多以出口爲主的茶、樟腦、米、鳳梨、香蕉等傳統產業和許多新興產業；此外，更積極參與土木、電力、機械、肥料、水泥等政府的基幹事業。他們得到臺灣豐富的自然資源及低廉的勞動力，再加上有了總督府的堅固保護網，在得天獨厚的條件之下，日本獨占資本家完全支配臺灣的所有產業，朝向獨占資本主義的形態發展。¹³²

¹³² 相關內容參考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史》；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喜安幸夫，《日本統治臺灣秘史》等書。

但是這麼急速的資本主義化，站在臺灣人民的立場來看，只不過是個由日本資本和日本政府的力量所強制帶動的被動現代化，而且這樣的現代化，却朝著往剝奪臺灣人民既定利益的方向進行。日本在農業部門，爲了確保自己的利益，實施了現代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但却在土地的所有權關係上，仍然保持在封建性範圍內，執行土地分配，因此導致臺灣農民陷入隸屬於地主/佃農的封建關係之中。工業部門也不例外，日本大企業的跋扈，造成了本土資本家的沒落，以及民族對立和階級對立日益加深的景象。

以全國農民組合和全國勞動者總聯盟的成立爲標識，臺灣的社會運動逐漸朝著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發展。左傾後的新文協，努力支持弱小階級的要求；民衆黨內也逐漸出現左翼傾向；而臺灣共產黨也主張臺灣民族的獨立。這個被定爲「解放」的時期，¹³³ 臺灣人民已具備正確的眼光，來審視日帝統治的虛實。

社會主義帶著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性質，牽動臺灣民族運動的方向，總督府便積極地進行森嚴的監視及禁制行動，¹³⁴ 他們制定治安維持法，¹³⁵ 來當作壓迫運動人士的武器。這當中，引發了無產青年、農民組合員、文協人士的檢舉事件，以及農民組合幹部的大規模逮捕事件、民衆黨的分裂策動等等，幾乎每天都要進行左翼社會運動人士的檢舉和公判行動。¹³⁶ 此外，在1931年滿洲事變之後，總督府更是大大的鎮壓左翼運動，導致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全面潰滅，大部分的左翼人士因而轉向文學運動發展。而

¹³³ 陳昭瑛，〈啓蒙、解放與傳統：論20年代臺灣份子的文化省思〉，「跨世紀臺灣的文化發展」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1998.10.22-23。

¹³⁴ 其實總督府對臺灣知識分子所進行的監視及活動限制，從文化啓蒙時期開始，即未曾間斷過。初期除了下令禁止文協的活動，解散各種研究會、讀書會、青年會外，還禁止民報系列報章雜誌在臺發行、要求廢刊及禁止販賣等措施，並公然的引起所謂治警事件—『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檢舉事件，來壓迫知識分子。

¹³⁵ 日本爲了防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活動，1925年5月12日在臺灣、朝鮮等殖民地頒布「治安維持法」。

¹³⁶ 相關內容，請參閱《臺灣民報》199-286號的報導。

1937年以後，日本更加強化軍國主義，對臺實施皇民化政策，連文學運動範圍之內的民族運動，再也無法展開。

另外，讓人惋惜的是，日據時期臺灣的社會主義運動，沒能成功地結合保守中間勢力和民衆陣營的力量。這是因爲包括臺灣共產黨在內的主要社會主義勢力本身，受到國際共產主義理論及派閥鬥爭的過度影響，一路走上分裂再分裂的關係。¹³⁷ 不過，在殖民地臺灣的惡劣環境下，社會主義思潮能夠爲民族解放，以及擁護弱小階級民衆的利益，付出最大努力，它不僅帶有強力的民衆指向性，更具有正面的意義。

二、臺灣社會主義勢力的理論主張

如前項所言，日據時期社會主義能在臺灣擴張勢力，並左右民族運動的方向，是在被帝國主義日本榨取的國內土壤上，接受了透過日本、中國傳入的世界性共產主義無產階級運動的影響之故。再加上社會主義標榜擁護大多數臺灣民衆的利益，因而得以空前的膨脹發展。社會主義理念在臺灣抗日民族運動中，如何扮演支配性意識形態的角色，我們從新文協、民衆黨、臺灣共產黨的主要文件中，就可得到答案。雖然這些團體在意識形態和運動重點上，呈現著些許差異，但是他們在基本認知上，都帶有社會主義的根本理念。下面的引文即可看出，新文協的活動目標已在其宣言中明確地揭示：

數十年來於茲，我臺灣狂熱地高倡推進產業振興及產業革命，拼

¹³⁷ 例如，爲新文協和共產黨分裂的上大派、非上大派的對立，來自日本共產主義者山川均、福本和夫之間的理論對立。

命打破封建時代的手工業及農村制度，不願留其片瓦，現在舊式的生產方式已將近滅亡，近世機械工業的隆盛也漸要達到極點。產業界煥然一新，都市大工廠蠅集，農村也是機械的音響隆隆，振動農民的耳膜，全島有大小銀行散立，金融機關也將達到完備的境域。然而由於這些文明的利器，從勤勞的臺灣農民所榨取的鉅大利潤到底是流到那裏去呢？農、工、小商人等無產階級日趨貧困，小資產階級不僅也像秋風落葉淪為下層階級，我們的努力，反而把我們生活上的一切變成絕大的威脅，建築在大資本階級產業組織上的政治，祇是在擁護特殊（榨取）階級，對我們臺灣民衆加以威壓，強制收買土地；支出巨額的產業補助金，對佃農及勞工糾紛，則採取強壓，解散集會，逮捕多數的社會運動戰士，投入黑暗的鐵檻。這些事實都是我們親眼所見的，這也正是特殊階級對弱小民族高壓的鐵證。我們臺灣民衆已經受了他們的壓迫，漸成他們的肉餅。日本資本主義已與歐美資本主義滙合，走上無法分離的過程，而暴風式的一般產業界的恐慌，金融界的破綻，又促使他們形成國際性高度帝國主義形態。他們也深為認識自己不日必定要打最後的吊鐘，所以必然的對殖民地的被壓迫民衆，展開最激烈的榨取政策，以謀暫時的安慰。醒來吧，奮起吧！我們臺灣的民衆呀！臺灣的社會，已經具備著我們的運動迅速地進展的必然條件，既經開拓曠闊的時代戰場已迫近我們，使我們走上激烈的鬭爭，進軍喇叭已經在我們的耳膜響亮地響了很久，前進！進展！！臺灣文化協會將永遠地為臺灣民衆，做農、工、小商人及小資產階級後盾的戰鬥團體！！¹³⁸

宣言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們主張階級鬥爭的同時，也主張民族的解放，在活動方面也跟舊文協不同，涉及到政治主張，也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言論。其主要內容大都為攻擊資本主義制度及帝國主義的支配，或是弱小民族及無產階級的解放等問題。這都說明了主導新文協的指導者，針對資產階級，展開無產階級的階級解放運動，同時針對帝國主義日本，也主

¹³⁸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頁205-206，譯文轉引自王詩琅譯，《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361-362。

張臺灣的民族解放。這是不同於之前的文協，以知識分子為中心而展開的文化啓蒙運動。那個時期的民衆只是一個被動接受啓蒙教育的客體而已，但是到了這個時期，運動的思考中心已經轉移到民衆，特別是農民、工人等廣大的無產民衆群體。

新文協之外，舊文協幹部所組織的『民衆黨』，在成立初期因總督府的各種刁難牽制，排除了民族運動和階級運動的相關言論，在「本黨以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為綱領」的宗旨下出發，不過在蔣渭水的領導之下，很快的就極力鼓舞臺灣人參與反日的政治運動。而這個政治運動包含階級解放的內容。蔣氏受到孫文的革命戰略影響，特別是民生主義和聯合陣線的影響很深，如主張聯合世界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以及在國內採取「士農工商學」聯合陣線，就是反映第三國際殖民地革命的策略。蔣渭水權衡臺灣形勢，認為孫文的革命戰略頗為適合現階段臺灣的革命情勢。¹³⁹ 於是，1927年10月28日，民衆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本黨對階級問題的態度」的決議案，宣示該黨的奮鬥目標如下：

- 一、階級運動及全民運動，必須同時並進；
- 二、援助農工階級，以實行階級運動；
- 三、加強全民運動中之農工組織；
- 四、聯合各階層包括農工及中產階級，成立聯合陣線。¹⁴⁰

雖然避免階級鬥爭的敏感字眼出現，而提出階級妥協。但事實上，民衆黨成立大會所通過的黨綱，即已明示該黨自始即是要建立一個立基於廣大社會結合之上的群眾運動。誠如黨綱所宣示：「本黨將亟力促進農民、工人

¹³⁹ 參考簡炯仁，《臺灣共產主義運動史》，頁47。

¹⁴⁰ 蔣渭水，〈臺灣民衆黨的指導原則與工作〉，《臺灣民報》235號(1928.9.9)、181號(1927.11.6)。

運動及社會組織之成立」，¹⁴¹ 足見其對無產民衆在民族運動之內所扮演角色的重視。之後在謝雪紅等共產主義者的滲透計劃下，民衆黨的幹部以及黨員逐漸左傾。1929年10月17日，召開第三次黨員大會，大會宣言宣稱：

由於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帝國主義的根基業已動搖，其傾覆已指日可待，其傾覆將因各地無產階級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激化而加速。因此，民衆黨藉由團結島內的群眾運動以及與國際解放陣線結合，積極參加世界反帝戰爭。¹⁴²

該宣言不但顯示民族主義路線，而且也呈現國際主義路線，這正表明了馬列主義已日漸吸引民衆黨黨員了，而1930年的民衆黨綱領顯示：

- 一、爭取勞工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之政治的自由；
- 二、擁護勞工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之日常利益；
- 三、努力擴大勞工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之組織。¹⁴³

由以上宣文可看出民衆黨有越來越左的傾向。民衆黨提出階級妥協，試圖凝聚全民的力量，建立起抗日聯合陣線，並積極參與農民、工人運動，成立臺灣工友總聯盟等，可知它是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辯護。

接下來，以國際共產主義活動的一環成立的臺灣共產黨，更無須懷疑它的社會主義成分；它以新文協為據點，以農民組合為活動的中心，積極指導農民運動。它雖然受到國際共產主義強力的影響，在謝雪紅和王萬得、翁澤生之間，引起有關運動方向及路線上的意見對立，也因此經歷了

¹⁴¹ 簡炯仁，前揭書，頁48。

¹⁴² 簡炯仁，前揭書，頁102-103。有關民衆黨和臺灣共產黨之間的連繫、影響等，可參考該書。

¹⁴³ 吳三連、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頁434。

多次的分裂及重組，不過如1933年6月的臺灣共產黨政綱所示，它主張徹底的以無產階級為中心，展開民族解放運動。

- 一、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使臺灣獨立。
- 二、沒收帝國主義的一切企業及銀行。
- 三、沒收帝國主義的土地，分與貧農、中農。
- 四、實行八小時勞動制，實行失業的國家救濟，實施社會保險。
- 五、廢除一切苛稅，雜稅，實行統一累進稅。
- 六、革命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的絕對自由。
- 七、建立工農民主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 八、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 九、與日、華、印、韓的工農聯絡。
- 十、與蘇維埃聯邦及世界無產階級聯絡。¹⁴⁴

透過上面的敘述，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思潮的流入臺灣，以及得到發展，成了能結合民族主義運動和無產民衆要求的一個催化劑。當然這些團體所接受的社會主義理念及基本立場，並不相同。例如民衆黨仍然堅持在民族主義立場上，聯合無產大眾解放運動；新文協較為著重在無產階級運動；而臺灣共產黨就把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作為其終極目標。不過，當時指向於「解放」的政治社會運動，日益活化，無論左右哪一陣營，都把階級解放和民族運動的關係，提出來當作運動的核心議題。這樣的情況，我們透過下面兩場講演會的內容，即能窺知一二：1927年8月17日，『東京磺溪會』在彰化主辦了「臺灣社會改造講演會」¹⁴⁵。張道福、連溫卿、蔡培火、洪石柱、王敏川等十多人參加的這個講演會，是在日警的監視下勉強進行。與會的大部分人士都以為要改造臺灣社會，必須展開符合大多數大眾利益的運動，並認定現階段有必要展開無產階級鬥爭。相對於此，9月

¹⁴⁴ 簡炯仁，前揭書，頁141-142。

¹⁴⁵ 相關報導，請參閱《臺灣民報》171號(1927.8.28)。

13日到18日，民衆黨的臺南支部也在臺南主辦了一場「臺灣社會問題改造觀講演會」，¹⁴⁶ 韓石泉、王受祿、陳逢源、盧丙丁、彭華英、謝春木、蔣渭水、蔡培火等民衆黨人士參與及提出意見。其中除了王水祿和陳逢源反對階級鬥爭，強調民族運動中爭取政治自由以外，其他人大部分都肯定階級運動的必要性。而蔣渭水則認為東洋的被壓迫民族，要同時解決民族、階級這兩個問題；他引用馬克思、恩格斯、高資基、列寧、大山郁夫、布施辰治、孫文等左派學者的民族觀，綜合參考他們的見解之後，提出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必須要跟階級運動保持一致的腳步。另外，蔡培火認為以現階段臺灣社會的實情和運動團體的現況來看，首先應組織可以辯護各階層利益的小團體，然後展開各自的運動，再將全國國民團結在一起，並行推動民族運動、階級運動、婦女運動，方是可行的辦法。這兩場講演會，當時社會運動的主要人士幾乎都參與了，可見在1927年前後，社會主義思潮及階級鬥爭，已經變成臺灣社會運動的主流議題。

形成這些變化的原因，不外乎是臺灣的殖民地政治環境，以及日本大資本家所主導的經濟掠奪使然。因此，社會主義運動團體的主張—無產大眾的解放，乃是在把握住殖民地臺灣的實際狀況後發出，這說明它確實的掌握了時代性，因為這些主張及付諸實踐的努力，所反映的即是大多數臺灣人民的心聲和期望。

三、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現代性特徵

社會主義原是為反對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貧富差距、人的物化和疏離現象，進而追求和平、平等的一種思潮。隨著俄羅斯革命的成功，它獲得其

¹⁴⁶ 相關報導資料，請參閱《臺灣民報》176-184號(1927.10.2-11.29)。

理念實踐可行性的證明，乃開始傳播到世界各地。在臺灣，它將抗日民族運動的方向，從啓蒙移到解放，不僅帶來了質的變化，並要求知識分子進一步思考往後的臺灣社會形態。因此，有關社會主義所帶來的現代性思考，在這裡有必要加以說明。

如果說一般的啓蒙運動，主要是強調人性的解放、博愛、人道主義等普遍現代性的話，那麼以擁護弱小民族、無產階級爲主要目標的社會主義方案，就對普遍的現代性提出懷疑。特別是在臺灣，在日帝所主導的殖民資本主義化過程中接受的現代性，更是與「工具的現代性」保持了一定的距離。民族差別政策，分配經濟利益上的嚴重不均衡，導致啓蒙運動無法持續下去，以經濟層面上的壓迫/被壓迫、榨取/被榨取關係的解除爲主要訴求的社會主義理念，因此得到民衆的青睞。加上國際社會主義鼓勵世界所有殖民地的解放，因而社會主義理念，被理解爲重視民族平等、追求真正解放之「解放的現代性」，他們把社會主義理念，當作同時能達成階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媒介。

階級解放和民族主義的強力結合，可以說是第三世界國家現代性的共同模式。現代初期在西方，資產階級名副其實的扮演起民衆的代表角色；相反的，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資產階級和基層民衆之間，打一開始就存在著矛盾。其結果，主張自主性現代化及民族獨立運動上，民衆勢力的意義和比重相對變得強大，他們所堅持解放的現代性，也就成爲這個時期主要的現代價值。民衆升格爲民族運動的主流，以世界史的眼光來看，是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史的普遍現象，而這也是臺灣被帝國主義侵略及支配的特殊歷史中，所反映出來的現代性特殊面貌。

社會主義思潮，原本是來自以克服資本主義本身的弊端爲主要目標的急進民主主義變革理念。隨著資本的集中和機械生產所造成的階級差別，以及人的物化、疏離現象的深化，它開始具有解除這些弊害的積極意義。因爲這個原因，對於社會主義社會體制的到來，有些人甚至以爲它已超越現

代，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但是現實社會主義體制，根本上是被編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那是因為現代世界係以國家間體系運作，所以它仍然屬於現代。¹⁴⁷ 而且社會主義的許多理念，也可以在現代性範疇內理解。因此，社會主義可以說是爭取現代性的另一個途徑。

這個另一種的現代性，可以「解放的現代性」概念來加以說明。雖然啓蒙時期強調人性的解放，又重視人的平等，但同時也積極接受「工具的現代性」—資本主義體制發展的直接動因。相較之下，社會主義方案針對帶給帝國主義發展的「工具的現代性」，却提出異議，並對階級分化及從中被深化的階級差別、民族差別、人的物化及疏離等，提出了強烈的批判。這表示日據時期社會主義路線所堅持的理念，本身帶有對日帝主導資本主義體制的批判性格，同時擁有改善人的不平等狀況的積極意義。

再者，社會主義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在於它指向「民衆連帶性」。在殖民地臺灣，社會主義所提出的無產階級解放，正符合民衆的現實情況，它能適切地掌握民衆的生活要求，確保民衆連帶性。這裡所謂的民衆，是相對於支配勢力的概念，指的是所有被支配階級的聯合勢力。民衆的概念屬於歷史性範疇，它隨著社會成員和支配階級的變化而變化。日據時期臺灣社會主義運動中指的民衆，就是受到日本人和資本階級的支配，而在政治上、經濟上呈現出與他們懸殊落差的大多數臺灣人民。他們的共同願望是仰賴社會主義思潮的移入和發展，使能在歷史的檯面上正式登場。社會主義所指向的解放現代性，以及民衆連帶性，即使到了廿一世紀的現在，仍然具有值得討論的價值，值得思考的空間。

¹⁴⁷ 華勒斯坦認為現代世界體制是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為其基礎，以國家間體制為上部結構的巨大的體制。他從國家間體制的脈絡中來說明現代世界體制，如此較容易理解社會主義國家具有的「資本主義的痕跡」。參考Wallerstein Immanuel Maurice, 《Historical capitalism, with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第三節 皇民化時期現代性的扭曲與挫折

一、日本殖民主義的本質和皇民化運動

日本的殖民地政策，如第一節所作說明，是由本質性經濟動因，加上從屬性軍事動因所構成。¹⁴⁸ 這從它本身的帝國主義性格上，可以找出原因。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雖然具備了一些現代國家的特徵，¹⁴⁹ 推動政治、經濟上的現代改革，不過由於其封建遺制仍然殘存，政治民主化以及經濟上健全的資本主義發展，仍然有待解決。在西方，民族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新興資本階級成爲現代社會的基礎；相對的，在日本却以天皇爲主的軍人、官僚家等封建殘餘勢力，成爲社會發展的基礎勢力。因此，現代初期的社會改革方向也呈現不同的面貌，譬如西方的現代係指向於市民社會，但日本却與此相反，朝著國家、主權、政府均屬天皇的專制政治、臣民社會發展。這些軍閥統治階級，透過清日戰爭、俄日戰爭的勝利而穩住勢力，逐漸變爲強力的法西斯集團。特別是在1931年的滿洲事變，以及1937年的中日戰爭的挑撥開始，全面展開對中國大陸侵略的軍事行動。而偏偏開戰之初又連連戰勝，¹⁵⁰ 再加上日本國內政黨政治崩盤，以及極右團體紛紛成立，日本乃轉向超強硬國家主義，形成軍國主義集團，支配著所有的政治決定。

¹⁴⁸ 這一點無論是在臺灣或在朝鮮都是一樣。日本把臺灣設定爲侵略南洋的南進基地，同樣也把朝鮮當作侵略大陸的兵站基地。

¹⁴⁹ 例如打破封建體制、確立了天皇親政、實施憲法、開設議會、實施了資本主義生產、得到科學發展等。

¹⁵⁰ 蘆溝橋事變中日開戰之後，日軍的進展勢如破竹，開戰後半年便攻陷首都南京，翌年三月，日本分別在北京和南京成立南、北兩個傀儡政權，控制華北和華中的廣大占領區，1938年五月日軍進擊西州，8月繼續進擊漢口、廣州，不出三個月，中國中西部軍事要塞武漢三鎮，以及中國南方門戶廣州便相繼陷落。

早在1932年到33年，日本國內進行了肅清反對軍國主義思想的行動，大量逮捕了左翼人士，並在1937年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日本進入了國家總動員戰時體制。而這個戰時體制，嚴重影響到殖民地政策，促使總督府開始以強烈手段來壓迫臺灣的所有社會運動及言論自由。

戰爭時期的對臺政策，一般可以皇民化運動來加以概括。所謂皇民化運動，乃是民族抹殺政策。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它是從1919年被提出以來即貫徹於全殖民時期的同化主義的強化版。其主要目的是為改造臺灣人為日本人，並於戰爭體系內動員他們，進而順利進行戰爭。日本為了有效的推行皇民化運動，首先最重視日語的普及。日語的普及，其實是從佔領初期即已開始實施，不過到了這個時期則帶有強制性質，並禁止臺灣人使用臺灣話和漢文。臺灣人違反時會遭到課賦罰金、嚴格處罰或解雇，因此造成漢文的使用逐漸減少，到了1937年，所有報紙的漢文欄遂被廢止。透過強硬的皇民化主義者，同時也是當時臺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所說的一句話：「絕對禁止臺灣話和漢文，誰不滿，誰就回中國。」¹⁵¹ 即可推測當時臺灣人所處的情況。

除了語言的完全日本化要求以外，為了要抹殺臺灣人的中國傳統風俗，統治者也進行了生活習慣的日本化政策。在這政策之下，首先是推行神道信仰的普及化，在「全島各戶無處不祭拜神道神祇」¹⁵² 方針之下，強迫臺灣人祭拜稱為日本伊勢皇大神宮的所謂大麻神符。此外，又以打破舊習慣作為藉口，開始實施國民精神改造運動，撤去中國傳統寺廟，新設日本神社，進一步禁止穿臺灣裝等，逐漸展開生活習慣的日本化。不過，另外也相對實施臺人日人間婚姻和入贅的合法化，以及改善地方制度等懷柔政策，藉以誘使臺灣人的積極合作與參與。

¹⁵¹ 向山寬夫原著，楊鴻儒等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民族運動史下》，頁1296。

¹⁵²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別篇詔勅令旨諭告訓達類纂》，頁648；轉引自前注同書，頁1297。

日本不只對臺實施生活習慣的日本化政策，只要是妨礙到戰事，無論何種形態的媒體，均嚴格加以取締。例如制定臺灣蓄音機唱片取締規則、輸出活動寫真軟片取締規則，即分別是將唱片和電影影片置於檢閱制度之下，來限制臺灣人的精神自由。並隨著國際危機的升高，不斷增強軍備，連武官總督也跟著復活。不僅如此，爲了加強維護治安，還制定不穩文書臨時取締令、修正軍機保護法、軍用資源秘密保護法、滿州國及中華民國渡航證明規則等，來壓迫臺灣人的人身自由。戰爭進入長期化，爲了確立戰時國家總動員態勢，同時也制定了國家總動員法，由此，臺灣的青年遂被動員加入與祖國中國的戰爭。此外，一般人民也被動員投入修整道路、植樹、開墾、廢料回收等各種義務勞動，並得隨時準備接受國民徵用令、船員徵用令、國民勤勞保國協力令、勞務調整令等各種徵用令的調動。

接著，1941年日本對美國、英國宣戰，挑起太平洋戰爭之後，更進一步制定報紙刊載限制令、郵件臨時取締，以及有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臨時取締法、脚本及劇本檢閱規則等，以壓抑臺灣人的言論自由；制定國防保安法、修正治安維持法、戰時刑事特別法，以強化對臺灣人的監視；籌組皇民奉公會、大政翼贊會等組織，無論在前線或後方，全面的進行對臺灣人的掌控，把每一個人都編入戰時體制。

在日本稱爲十五年戰爭（1931-1945）的這個時期，臺灣被編入所謂的高度國防經濟體系，從支援戰爭，到被規劃成作戰基地，甚至後來成爲空襲的對象，一直都處在戰場的前線。在思想方面，也被迫接受日本的絕對性國家主義，特別是戰爭日益吃緊的太平洋戰爭時期，不少知識分子被日本的「白種異民族英美帝國主義與長年被壓迫的亞洲有色民族的戰爭」宣傳所誘騙，而轉換成親日行爲。他們或讚揚戰爭，或鼓吹從軍，或以創作國策文學等的方式，¹⁵³ 來協助日本的戰時政策。由此，臺灣知識青年從文

¹⁵³ 有關從事過抗日民族運動人士的親日行爲，參考向山寬夫，前揭書，頁1468-1469；柳書琴，〈殖民地文化運動與皇民化：論張文環的文化觀〉（《殖民地經驗與臺灣文學》頁

化啓蒙運動以來，接受現代思潮，追求民族的政治自由、經濟平等、自主性現代化等所做的努力，被迫一一遭到扭曲。

二、天皇制法西斯主義與現代性的挫折

在戰爭期間日本對臺推動的皇民化運動，若以一句話來形容，那就是把臺灣人改造成日本人—能夠為日本犧牲生命的人。¹⁵⁴ 日本為了有效達到這個目標，提出了「日臺融洽」和「大東亞共榮圈」的說法。所謂的「日臺融洽」或「日臺一體」，就是推行皇民化運動的內在原理兼支配理念。分析其核心內容及結構¹⁵⁵：第一、只要把萬世一系的天皇，當成活著的神來崇拜，並努力完成萬世輔翼臣節的每一個人，都能成為皇民，並受到一視同仁的皇恩。這是日本國體精神的本質意義所在，意思是說，即使是臺灣人，只要能夠體現日本國體的精神，那麼就能成為真正的皇國臣民。日本提出這樣的說法，來要求臺灣人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付出心血。第二、所謂的肇國精神，就是無論是先在者或外來者，都一視同仁讓他們成為無差別的日本臣民。因此主張「日臺融洽」乃既是必然，又是唯一的目標。第三、他們主張這些概念為世界大勢之一，當時與德國、義大利結成三國同盟的日本，它的任務在於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日本從中國古代的社會思想中找出共榮圈的根本精神：那就是小範圍為家，大範圍為國的觀念。日本視自己為一個皇帝，其他國家為臣民，在天皇與臣民之間的關係

1-43)，以及《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臺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¹⁵⁴ 尾崎秀樹，蕭拱譯，〈戰時的臺灣文學〉，《臺灣的殖民地傷痕》，頁212。

¹⁵⁵ 有關日本國體精神和大東亞共榮圈的內在理念，參考整理自〈極秘：內鮮一體理念及其具現方策要綱〉，《大野文書》1260，朝鮮總督府。(轉引自崔由利，《日帝末期(1938-45年)「內鮮一體」論與戰時動員體制》，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頁15。

上，應用君臣之間的「義」、父子之間的「情」，來說服殖民地國家的協助和推崇。大東亞共榮圈的基本理念，乃是萬邦能各自固守自身的位置，以維持國際間共存共榮，同時對內完成「日臺一體」，對外以日本為盟主來達成東洋的建設，如此才能確立世界和平的大據點。第四、「日臺一體」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為日本人和臺灣人之間，在血緣上和文化上都具備了高度的近似性，乃至一體化的許多條件。如此，把臺灣人塑造成天皇的臣民，並以天皇為中心，讓臺灣人積極參與建設東洋帝國，這就是皇民化運動的理論基石。他們把這個絕對性國粹主義、日本的極右思想，以大亞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等反西方東洋團結的邏輯來加以包裝，並強加於殖民地臺灣人民的身上，同時也把它當作至高無上的原則，用以剝奪臺灣人民的思想與言論自由，進而在物質、精神兩方面，把臺灣人動員到非理性的戰爭當中。

這個邏輯是皇民化運動的內在理念，也是日本為使他們的侵略行為合理化而編造出來的藉口，本質仍在於天皇制法西斯主義。所謂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就是「天皇歸一」的思想，加上「八紘一宇」的邏輯，其內容係以萬世一系的天皇為中心，而建立起祭政一致的國家形態。可見日本是在具有封建性質的天皇制基礎上，融入資本主義的產物—帝國主義，再合成創造出所謂的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在1930年代，日本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形態，佔據了大部分的東亞國家，為了順利推動他們所發起的侵略戰爭，乃以「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名來包裝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再把它強加於殖民地國家身上。日本企圖把世界歷史的進程軸心，從西洋扭轉到東洋，特別是以日本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大東亞共榮圈」。而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就是在絕對主義政治體制上，加上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現代代表著科學、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是以民主主義為中心價值的時代，不但重視相對主義原理，同時也強調中立價值。而日本却在這個現代理念上面，硬是把違背現代價值的天皇絕對主義加進去，這個作法本身就是扭曲

現代性。因為現代就是代表否定教皇或天皇絕對主義，百家思想和理念得以共存，許多不同集團和民族，各自經營自己生活的時代。「大東亞共榮圈」，其說法上對西方現代堅持懷疑及否定的立場，其實就是日本式扭曲的現代主義，因為日帝以違背現代理念的專制主義、絕對主義的天皇制法西斯主義，當成能夠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邏輯來傳播其「大東亞共榮圈」理論，但是「大東亞共榮圈」的邏輯本身，告訴我們的却是，日本自己試圖把自己的現代化經驗強制複製到整個東洋地區，而這正是日本所要打倒的歐美帝國主義的作法。

殖民地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在拒絕同化主義的同時，一直都在為追求現代價值和民族解放，貢獻心力。但是到了皇民化時期，却不得不面對空前強大的日本化壓力。當時臺灣成立了幾個保持跟日本同一立場的極右團體，也出現了讚揚戰爭並鼓舞士氣的文學作品，有些知識分子甚至透過演講，積極支持志願兵制、徵兵制等，在在都說明皇民化運動造成了知識分子的精神荒廢。對於當時之所以會造成知識分子毀節或屈從，除了軍國主義的武力壓制以外，或許還可猜測出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初期日本在中國大陸的戰爭節節勝利，以及國際法西斯主義的世界性擴散，讓知識分子對建立在科技基礎的現代理念產生了懷疑。由於皇民化初期日本在各戰場得到勝利，因此他們可能誤認日帝的法西斯邏輯乃將來的歷史趨勢。再加上日本不斷地強調他們正在對抗西方帝國主義，這也可能讓他們一時弄不清日帝法西斯主義的侵略與支配本質。不僅如此，在所有民族解放運動都遭致潰散的狀態之下，表面上提出兩國國民平等的皇民化邏輯，讓臺灣的知識分子，對脫離民族差別，以及建立如日本一樣強盛的現代國家，一時產生了一線希望，因此試著接受被日本扭曲的現代理念—大東亞共榮圈，來摸索臺灣的現代化。由此，臺灣知識分子透過啓蒙企劃和社會主義方案來追求現代性所做的努力，就在日據末皇民化的暴力之下，遭到嚴重的挫折。對臺灣人民來說，整個日據時期，可以說就是透過意識、文化的啓蒙

來對抗殖民政策，並追求自主性現代化的艱辛路程。日據時期臺灣人所追求的豐富而多元的現代方案，對現今正面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我們，或許可以帶來許多啟發。

現代性與臺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